

「蒙古風景」？： 五族共和下被展示的他者

余慧君

摘 要

本文以蒙古獨立運動過程中，在中華民國境內舉辦的3個包含蒙古展件之大型展覽為主題，進行跨年代的展示文本分析。一是1914年，在中華民國直隸省天津，由嚴智怡團隊策展的「直隸省巴拿馬賽會出品預展」上，所展出的一組特殊蒙古包展件——「蒙古風景」。二是1924年，由陶行知策展，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科主辦的「全國教育展覽會」，其中的「蒙古生活及教育出品」展區。三是1936年，由馬鶴天等開發西北協會成員籌劃，在南京國貨展覽館舉辦的「西北文物展覽會」上之蒙古文物。藉由這3個展覽的蒙古展件及策展論述，分析蒙古獨立運動過程中，具有政治主導地位的漢族文化官僚，如何以展覽為媒介，透過蒙古包這類最足以代表蒙古遊牧生活特色的文化物件，在民國建立之初，建構「五族共和」的展示文本，並隨著國族運動的發展，到了1930年代的展覽中，蒙古人逐漸被再現為西北「少數民族」之一。

關鍵詞：直隸省巴拿馬賽會出品預展、全國教育展覽會、西北文物展覽會、蒙古獨立、五族共和

A “Mongolian Landscape”?: One of the Others under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ive Nationalities”

Hui-chun Yu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large-scale exhibitions hel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xhibits and objects from Mongolia so as to highlight the process of latent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first exhibition organized in 1914 by the curatorial team of Yan Zhiyi, was called the Zhili Province Pre-exhibition of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in which a Mongolian yurt and two Mongols were in display. The second exhibition entitled National Education Fair, was organized by Tao Zhixing and held in 1924 at th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The third named Northwest Heritage Exhibition, was held in 1936 at Nanj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Ma Hetian and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wes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rom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Mongols in these three exhibitions, this paper enquires in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he “republic of five nationalities,” and its shift from the conception of “nation-building” to the function of racial classification and minority group status.

Keywords: Zhili Province Pre-exhibition of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National Education Fair, Northwest Heritage Exhibition,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Republic of Five Nationalities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蒙古風景」？：五族共和下被展示的他者*

余慧君**

壹、前言

20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菁英，因為東洋、西洋經驗的影響，逐漸累積觀展與策展經驗，成為擁有文化資本的專業策展人或博物館館長，並藉此取得經營更大規模文化事業的可能性。透過國外參訪見習，逐漸掌握以「展示」為手段的文化知識生產機制，中國開始出現具有策展專業能力與展會經驗的第一代專業官僚，例如，被譽為中國參與世界博覽會最重要推手的陳琪（1878-1925），1904（清光緒30）年率領湖南代表團到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參展，接著於1910（清宣統2）年總籌並執行中國第一次的全國博覽會南洋勸業會，1912年擔任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局長，總籌並監督中國參與巴拿馬賽會的所有細節。¹ 像陳琪這樣的中國第一代策展專業人才，是在實業救國脈絡下逐漸養成其專業能力，因為大型的跨產業博覽會或商品展會活動，愈來愈為官方與社會接受。同時，在「文化救國」的驅動之下，博物館這類永久並固定式的文化展示機構亦成為渴求，因此極度需要有策展能力與文化視野的專業文化官僚。

*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6年8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7年1月9日。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¹ 蔡克驕，〈近代中國博覽業的先驅陳琪及其著述〉，《近代史研究》，第1期（2001年7月），頁307-313。

民國時期，愈來愈多文化官僚逐漸掌握策展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術，並生產出各式各樣短期的國貨展覽會、美術展覽會、文物展覽會、教育品展覽會等，而博物館這類以辦特展與典藏為核心工作的常設機構，在中國各主要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累積出以「展覽」為形式的大量中國近現代歷史文本。同時，也促成愈來愈多非專業的策展人，包括教育工作者或黨國宣傳體系成員，為了在短期內有效地傳播理念，決定以展覽為媒介，加入策展的行列。

作為新興的文化生產機制，博物館與展會專事生產「展示」（exhibit）文本，透過實際物件與解說，向觀眾傳達觀念與論述。而每個展示文本，皆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取得被展示的需求，主要以物件（object）並文字、影像等媒介，呈現資訊與知識脈絡。這些展示文本，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考察，提供嶄新的整合視野，包括：什麼物件被展示？為何被展示？為誰展示？如何展示？不同群體的觀眾，對展示的反應有何不同？等等諸多問題。

本文的出發點，是1914年，在中華民國直隸省天津，由嚴智怡團隊策展的直隸省巴拿馬賽會出品預展上，所展出的一組特殊蒙古包展件——「蒙古風景」。藉此探問中華民國「五族共和」政治論述發展過程中，具有政治主導地位的漢族文化官僚，在蒙古獨立運動的衝擊下，如何以展覽為媒介，透過蒙古包這類最足以代表蒙古游牧生活特色的文化物件，建構「五族共和」的展示文本。

嚴智怡（1882-1935）是曾與陳琪共事的民國初期重要策展專業人才之一。他是天津南開教育體系創辦人嚴修的三子，1907（清光緒33）年畢業於東京工業高等學校應用化學科，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的首任直隸實業廳工商科科長，同時兼任直隸商品陳列所所長，因而出任直隸巴拿馬賽會出品協會事務局局長，負責統籌直隸省參展巴拿馬賽會之各項事務，並於1918年籌備建立天津博物院，1930年催生天津市立美術館，是20世紀初期中國少數兼具世博會經驗與博物館經驗的專業策展人才之一。²

為了與1914年的直隸省巴拿馬賽會出品預展上「蒙古風景」展件作比較，本文選擇了另外兩個蒙古物件相關展覽，進行跨年代的展示文本分析。一是1924

² 王翁如，〈實業家嚴智怡〉，《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期（1995年9月），頁117-120。

年在南京東南大學舉辦的全國教育展覽會上之蒙古生活及教育出品；二是1936年在南京國貨展覽館舉辦的「西北文物展覽會」上之蒙古文物。這3個展覽在年代上大約都相隔10年，足以反映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到全面對日抗戰前夕，國內並國際政治發展之不同階段。而且這3個展覽的策展主導者，分屬於不同的政治集團。嚴智怡因為家族關係與個人務實的行政能力，是袁世凱掌權時期北洋直隸政府官員中極被看好的年輕政治新秀；陶知行（1891-1946，或名陶行知）為「全國教育展覽會」上之「蒙古生活及教育出品」的策展人，是一位具濃厚左派進步意識、以推動平民教育為職志之左派知識分子，並曾因批評時政而遭國民政府追緝被迫逃亡；而「西北文物展覽會」則由國民黨中央核心人物之陳立夫（1900-2001）、馬鶴天（1877-1962）、邵元冲（1890-1936）等人主導。這3類手上擁有不同政治資本並文化資本的策展人，對五族共和的國族想像，未必一致，不過，卻都曾採用策展手段，探問五族如何共和，欲將意識型態具體轉為文化實踐。

1910年代至1930年代，蒙古獨立運動一路推進，從大蒙古國於1911年12月29日第一次宣布獨立，又於1915年6月因中俄蒙協約簽訂而失敗，到蒙古人民政府於1921年7月11日再次宣布獨立，並於1924年11月26日開始實行共和國政體，正式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³ 中華民國是蒙古國族認同建構中具有嚴重威脅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而蒙古，包括外蒙與內蒙，卻被中華民國視為「五族共和」國族想像中不可或缺的「我群」。⁴ 當蒙古國與中華民國同時進行各自的國族建構工程，並且雙方的國族想像互為彼此的國族危機時，中華民國境內的這3個展覽，如何展示蒙古物件？「蒙古人」在這3個不同的展覽中，如何被中華民國策展方賦予去主體性之後的客體化身分？而這些客體化身分，如何反映出策展方對「五族共和」論述的詮釋差異？最後，就這3個展示文本所見，懷抱不同意識型態的漢人知識菁英，究竟提出哪些策略與方法，以使「五族」具體

³ 當時蒙古獨立雖然未得到國際支持，蘇俄亦只支持蒙古的高度自治，但是蒙古擁有獨立處理內政並外交政策的主權，已是不爭之事實。見藍美華，〈蘇俄早期對蒙政策初探（1917-1924）〉，收入中國邊政協會編，《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頁476。

⁴ 關於中華民國國族想像中「重要他者」的分析，見沈松橋，〈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頁33-35。

「共和」出一個中華民國？

本文的主要分析資料，是策展團隊留下的各種策展籌備會議紀錄、專書報告、展覽目錄、展覽過程中的宣傳報導，以及參觀者的回饋意見等。針對蒙古展件的展示企圖與過程所引發的輿論效應，以及蒙古展件所牽涉的文化與政治議題，包括漢人文化菁英對蒙古文化的詮釋、萬國博覽會的人種展示倫理、蒙古獨立與中國實業發展等脈絡，管窺大清國宗主藩部體制結束之後，建構中華民國五族共和國族論述的複雜歷程。

貳、「蒙古生活出品」

1915年2月20日在舊金山開幕的「巴拿馬賽會」(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是自1851年首度在倫敦舉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以來，全球第十二次的世界博覽會，也是美國境內第四次舉辦這種超大型的國際級活動(mega-event)。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為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鑿成功並通航，大舉籌辦此次世界博覽會。這條運河大幅度縮短了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的海上運輸時間。美國掌握了這條運河，等於掐住了兩大洋之間軍事與商務運輸往來之咽喉。不過，屬於大西洋海域的大部分歐洲國家，當時陷入歐戰泥淖，無暇顧及新大陸的得意盛事。美國作為主辦國，必然積極邀請太平洋海域各國，而甫於1912年脫離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是美方極力邀請的參展對象。中華民國政府亦視此次萬國博覽會為重要外交場合，傾全力籌劃參展。有鑒於大清國時期「赴賽物品，漫無選擇，去取不當，求榮得辱」的慘痛經驗，⁵ 中華民國首度在中央政府農商部統籌規劃下，成立國家級的出品事務局，由陳琪掌舵，並大舉責成各省省政府成立省級的賽會出品負責部門，徵集全國具代表性的展件，參與美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國際競技場，以展示國體變革之後的中國現代性。

⁵ 嚴智怡，〈預會志略〉，收入氏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卷（天津：直隸實業廳，1921年），頁5。

由嚴智怡擔任局長的直隸巴拿馬賽會出品協會事務局（以下簡稱「事務局」），是直隸省負責此次賽會事務的主辦單位，正式成立於1913年11月1日，主要成員皆為直隸實業廳下各部門既有人力。這些專員基本上都受過實業調查的訓練，對於直隸地區農、漁、牧業物產，及傳統製造業的製造流程、原料、技術優劣等，詳細記錄並提出修正建議，以提升產能，增加商業優勢，發展現代的「考工」知識。⁶ 事務局以將近6個月的時間籌備賽會預展，工作項目包括：將美方提供的賽品分類目錄翻譯成中文，印刷後分送直隸境內各縣市議會及董事會；派調查員赴天津、北京、保定等城市，徵集特色產品；並派各調查專員沿著京奉鐵路至直隸省東北、津浦鐵路赴直隸東南、京張鐵路赴張家口、京漢鐵路赴南三府等，主動尋找適合參展的物件。徵集物品的原則是能「表示本國物產之特色，以圖海外貿易之發展，並藉以聯絡邦交，互換智識。」⁷

在各類賽會出品物中，分自營出品與補助出品兩類。自營出品者多為較有規模的輕工業事業單位，為了行銷產品而主動參賽，包括洋灰、帆布、鐵工廠等。另一類為補助出品，事務局針對特別具有海外市場競爭力的手工藝小型作坊，補助產品製作者參展費用，以「傳播我國物產之特色」，促成「生利國外」。補助出品的賽品名單，主要都是北京、天津等地歷史悠久的工藝作坊，包括銅、瓷、玉、景泰藍等古玩製品，天津泥人張泥塑、天津絨毯等傳統手工業等。而本文的主題「蒙古生活出品」，亦在補助之列。⁸

1914年6月14日至7月15日，在直隸省天津市天津公園內，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直隸省巴拿馬賽會出品預展」（以下簡稱「預展」）。所有的展品，包括手工業和製造業產品，以北京和天津兩大城市的出品商為主。北京出品商共131家，展品3,536件；天津出品商98家，出品1,488件，總出品物件數超過5,000件。出品類別包含教育、工業、礦業、農業、交通、食品、園藝、工藝美術類等，大致呈現20世紀初中國北方產業發展的最前沿。在此預展上經過評審委員認可的優秀展品，則可以正式運至美國舊金山，代表誕生剛滿3年的中華民國，進軍巴拿馬賽會。

⁶ 直隸實業廳的實業調查成果，會整理發表在《直隸實業雜誌》上，並以展覽方式呈現在直隸商品陳列所內，嚴智怡於1912年起擔任該所所長。

⁷ 嚴智怡，〈預會志略〉，收入氏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卷，頁9。

⁸ 嚴智怡，〈預會志略〉，收入氏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卷，頁12。

不過，此預展上，有一項極為特別的展品，品名為「蒙古生活出品」，「出品人為內蒙圖穆爾、外蒙車本兩人，出品為穹廬一座、橐駝一隻」，是直隸省商品陳列所調查徵集員黃祿彭，沿著京張鐵路至張家口，一路進行實業調查而徵集到的展品之一。所謂「蒙古生活出品」，展件內容是一座「炊具、食具、臥具、用器、祀神之設置皆備」的蒙古包，以及一隻駱駝。徵集的主要原因是「足以代表直隸境內一部分國民之生活」。⁹兩位出品人（物件提供者）——圖穆爾來自內蒙古，車本則來自於外蒙古。然而，就某種程度而言，兩位出品人亦為被展示的對象，因為在長達1個月的預展展覽期間，圖穆爾與車本實際居住在這個蒙古帳幕內，展演著以帳幕與其內各式生活器物所承載的草原生活方式。這個「蒙古生活出品」展件的原始構想，是嚴智怡策展團隊中、時任直隸商品陳列所編輯課課長華學涑提出的。原初的構想是兩位蒙古出品人攜帶全家眷一起到天津，住在天津公園的蒙古包內，展示蒙古族群在北方草原的家庭生活細節，但後來協商不成，「二人說天津天氣太熱，怕家眷尤其是小孩來天津熱死，堅持不來，所以兩人單身應約來津。」¹⁰

在預展的空間配置上，大部分的參賽品，都以室內展櫃方式，以物件的用途或材質屬性分類，靜態陳列在天津公園廣場左右兩側的展覽會第一館與第二館內部。第一館主要陳列美術、文藝、工業製造、農業、園藝、礦業等相關展品；第二館則展出教育成績圖片、標本、工業試驗所與水產學校展品等。在主要的兩個室內陳列館之外，則有3處開放式的室外展示，一為展示直隸常見家禽、家畜的牲畜部；二為展示直隸常見植物的園藝部；三為本文的重點「蒙古生活出品」，在展示現場亦稱「蒙古風景」，不與其他展件置於室內展廳，而是置於公園廣場中央右側，與廣場左側的餘興部戶外舞臺並陳。（圖1）為期1個月的直隸預展，入場券每張銅元30枚，共售出91,079張票，參觀人潮眾多。而「蒙古風景」作為一組完整的特殊展件，參觀者可以自由再行購特別票券入毡房內，實際參觀體驗毡房裡的蒙古生活情境。¹¹目前筆者尚未發現實際購票入蒙古包內參觀人數之統

⁹ 嚴智怡，〈預會志略〉，收入氏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卷，頁13。

¹⁰ 陸文郁，〈參加巴拿馬賽會瑣憶〉，《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428。

¹¹ 嚴智怡，〈預會志略〉，收入氏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卷，頁17。

「蒙古風景」?: 五族共和下被展示的他者

計資料，但是這組特殊展件陳列於整個天津公園展場的戶外廣場中心，是每個預賽參觀者必會看見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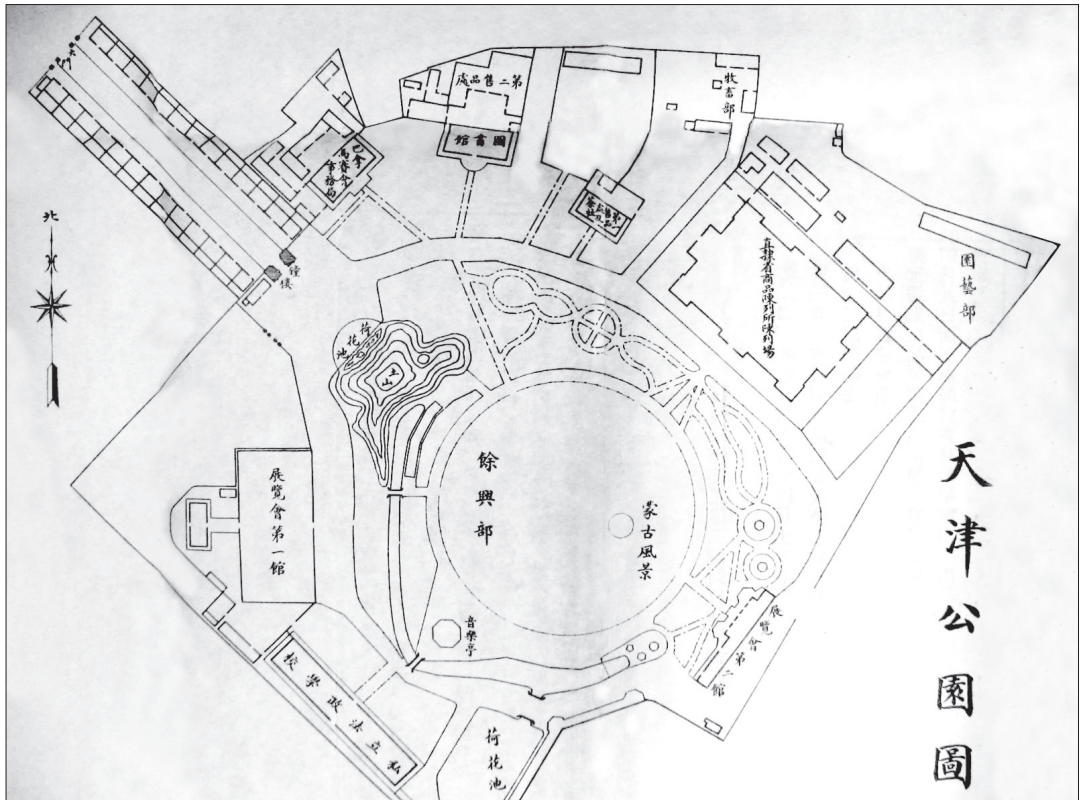


圖1、直隸地區巴拿馬賽會預展會場圖

資料來源：嚴智怡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卷（天津：直隸實業廳，1921年），頁13。

這組「蒙古風景」展品，並非單純放在展櫃上加上說明牌即可呈現的展品，它包含了動態的政治儀式與真實日常生活場景，是經歷1個月時間過程的「事件」展演。這組蒙古風景，應是中華民國展覽史上，第一次以實際物件並使用者，展示蒙古物質文明的動態情境。

嚴智怡領導的策展團隊才剛成形不久，天津預展是此團隊第一次策展大型博

覽會，對於如何運用展示手段宣揚中國科技與文明進展，仍處於摸索階段。在展覽概念與展示技術初試啼聲的情況下，直隸策展團隊之所以大費周章用動態方式展示「蒙古風景」，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關乎直隸經濟發展，因為直隸省境內有為數不少的對蒙貿易商號，張家口更是漢蒙雙邊貿易的重要據點。二是關乎政治，即當時已然發生的大蒙古國獨立運動。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1869-1924）旋即於1911年12月29日（清宣統3年11月10日），登基稱汗，宣布成立大蒙古國。此獨立事件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極為棘手的政治外交危機，同時也牽動內蒙古王公貢桑諾爾布（1872-1931）等人尋求獨立自治的可能性。¹²

而直隸省官方參展世界博覽會的目的之一，是為振興直隸地區的對外貿易，將直隸物產輸出歐、美、日本境外，同時刺激境內貿易。根據直隸商品陳列所於1914年的統計，張家口是直隸對蒙古貿易的重要樞紐，主要由四大商幫（外館幫、蔚州幫、山西幫、山東幫）主持，將茶、糖、菸、酒、絲、綿、銅等南方物產輸入蒙古，換取羊毛皮貨等，貿易量極大。¹³毛氈是清代到民國初年天津最重要的傳統製造產業之一，正是得利於蒙古的廉價毛皮原料所致。事實上，自盛清以來，以北京、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等城市聯結起來的中、蒙、俄貿易網絡，三邊貿易量驚人，並且影響京城富貴時尚與藏傳寺院周邊商業區之發展。¹⁴同時，庫倫眾多商號的放款借貸，亦是大蒙古國可以宣告獨立之重要經濟支柱。¹⁵但是自1911年蒙古宣布獨立之後，庫倫眾多商號紛紛倒閉，幾乎停止貿易，「蒙

¹² 白拉都格其，〈辛亥革命與貢桑諾爾布〉，《清史研究》，第3期（2002年7月），頁84-90；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頁393-425。

¹³ 〈圖畫：銷售蒙古之商品（附文）〉，《直隸實業雜誌》，第3卷第3期（1914年），頁1。本文引用的所有民國初年雜誌與報紙資料，都是由1911-1949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取得，該資料庫只標明文獻出處之年分與卷期，無標明出版月分，尚祈讀者見諒。

¹⁴ 賴惠敏，〈清乾隆朝內務府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1期（2003年3月），頁101-134；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2011年6月），頁1-54；賴惠敏，〈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年3月），頁1-46。

¹⁵ 賴惠敏，〈清代庫倫商卓特巴衙門與商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2014年6月），頁1-58。

古交易昔之輸出入總額每年蓋在五千萬兩以上，十年以來逐漸衰退，三年以來迨將停歇，吾國人烏可不於是而一注意哉。」¹⁶ 為了因應對蒙出口貿易量急速萎縮，直隸商品陳列所還收集了中國商人輸出蒙古的主要商品，在直隸商品陳列所內進行貿易展示，以鼓勵對蒙貿易，因為日本、俄國與德國，當時已經成為蒙古的重要貿易夥伴，是中國對蒙貿易的強力競爭對手。¹⁷

世界博覽會上的展品，對外是國家品牌形象的載體，宣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是現代國際社會的一分子（world citizenship）；對內則是國族想像共同體的象徵。天津預展的目的，是為了告知市民，直隸省政府透過嚴格篩選機制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品牌形象，因為品質優良的參展商品，得以向世界其他國家行銷中華民國，一個剛誕生不久的民主共和國。另一方面，預展也告知市民，因為國家品牌形象維護不易，凝聚境內各族群的國族共識，是國家品牌成功的關鍵因素。因此，1914年天津預展上推出的「蒙古風景」展件，可視為嚴智怡策展團隊利用世界博覽會這個傳播平臺，間接表達直隸官方對蒙古以民族自決為前提獨立建國的反對立場。

一個蒙古包與兩位蒙古人，作為直隸參與世界博覽會預展上的獨特展件，在嚴智怡策展團隊留下的文獻資料中，出現了「蒙古生活」、「蒙古風景」，或者「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等3個指稱。不同指稱詞，或許緣於溝通對象不同而產生。「蒙古生活」應是策展團隊內部成員彼此之間對此特殊展件的指稱，也是向未來讀者溝通的指稱，因為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這部策展執行歷程與博覽會場參觀記錄報告書中，稱之為「蒙古生活出品」。而「蒙古風景」一詞，是預展參觀者親身進入天津公園廣場之後，會實際看到的展示品，因為在現場毡幕門首樹國旗²，周圍欄以鐵絲木檻。幕之側建六面風旗杆¹，上書「蒙古風景」4字。¹⁸ 而「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則是與美方博覽會策展單位溝通時所用，因此在正式出品說明書中，將品名訂為「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而非「蒙古生

¹⁶ 〈圖畫：銷售蒙古之商品（附文）〉，頁1。

¹⁷ 〈東部蒙古重要輸出品及其貿易〉，《直隸實業雜誌》，第3卷第1期（1914年），頁1-24。

¹⁸ 〈世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會場大事記〉，《直隸實業雜誌》，第3卷第7期（1914年），頁8。

活」或「蒙古風景」。品名不同之原因，或許是緣於觀眾對象的不同，以及兩位蒙古出品人並未跟隨直隸代表團前往舊金山，只有蒙古包等實物被運往美國參展。亦即，在舊金山巴拿馬賽會上正式展出的「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是代表中華民國科技與文明高度的，可以讓國際買家下訂單購買的，具有蒙古風格樣式的可交易產品；而在天津公園裡的「蒙古風景」，主要觀眾乃直隸境內以漢人為多數的中華民國國民，觀看兩位活生生的蒙古人展演遊牧生活方式。

叁、世界博覽會上的「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

與所有其他即將赴美參加萬國博覽會展示的作品相同，主辦單位為「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撰寫了一份長達千字的出品說明書，詳細說明蒙古包的原料、製作原理、建構方式、蒙古族人在蒙古包內外的日常生活細節、生活習慣、文明特長等，茲摘錄部分如下：

其家屋之修建也，先有木架以多數木條斜排製成，用時如花籬一段，弗用時則合成一束。建屋者先闢木架八段、十段或十二段於地，成圓形，加木頂於上，頂亦條木所製如傘狀，普通者多兩半規合成覆以毡，悉依木架之尺度裁製。普通者多年覆一層毡，外絡以繩，屋頂之正中留天窗一，另覆以小方毡，平日啟其毡之半，以通日光出煙氣，雨日即嚴閉之。門則安於屋之東南，為雙格扇形，冬日覆以毡簾，夏日撤去。其屋內之裝置，緣牆多掛壁，衣以喀喇或綢綿為之，櫥櫃等木器亦皆緣牆安設自成一周。屋之西北方為供佛處，設佛龕或幕。佛之左正當門處，為最上，有貴賓始延讓於此。主人則陪坐於門內之左方。屋之正中率設鍋爐一具，爐由數個鐵圈製成，有立柱四，支銅鍋於上，鍋蓋亦銅製如盤形，肉熟時則仰其蓋，置肉於內以代盤用。燃料皆用牛糞，煙由屋頂透出直上雲霄。鋪地之毡亦隨屋之圓式製成，納作雲紋卍字文及種種花樣，皆出於蒙古婦女之手。其針黹精巧足見一般。屋外之附屬物，多立木為柵，入夜則聚羊於內，門前樹木椿數四，橫以巨繩，清晨繫多數乳牛，婦女行榨乳之事。平時且繫馬一二匹至三四匹，備鞍韉以待乘。放牲畜時，則挾長杆跨怒馬而去，驅數千百牛羊或駝馬牧於數十百里曠野

之中，皆談笑問事。越嶺跋山尤其長技，至外蒙則乘駝者較多。駝之善走耐勞，實為他動物之冠。¹⁹

這份說明書的主要內容，可能來自於徵集過程中對蒙俗的實地觀察，與報導人（即兩位出品人）的田野訪談，亦有可能參考了過往地方志或使臣遊記中對於蒙古包的文字描述。²⁰ 清朝自乾隆以來即對漢、蒙之間進行封禁隔離政策，禁止漢人移民蒙地；直到1902（清光緒28）年，清廷取消封禁隔離，轉而鼓勵大量漢人移民實邊，直隸境內的漢蒙混居狀況複雜之後，對蒙俗的書寫開始增加，並透過報紙、雜誌等大眾傳播媒體加速擴散。進入民國之後，許多蒙地調查遊記，以文字或照片方式刊登在雜誌媒體上，然而大部分落入刻板印象的傳抄裡，對蒙古包的描述精確程度，並未超越直隸策展團隊所撰寫的這份展件說明。直到留美社會學家吳文藻於1935年以親身田野調查研究方式，從歷史、社會組織、遊牧生產等面向，論述蒙古包所顯現的蒙古文化與其改良之可能性，並以詳細圖示之。（圖2）吳文藻的重要論點之一是「欲瞭解蒙古人的現實生活，首當認識蒙古包，因為這是蒙古物質文化中最顯著的特徵。」²¹ 嚴智怡策展團隊在實業調查過程中，應該也有類似的體認，當沿著京張鐵路從北京深入蒙境時，地理景觀最顯著的改變，應該是可移動的蒙古包取代固定式的磚木造民居。

直隸賽品徵集員在進行徵集工作之前，必須先清楚知道美方賽會當局接受哪些種類的參展品。「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之所以會被事務局徵集並補助赴美參賽，直接原因乃根據美方巴拿馬賽會當局提供的賽品徵集目錄中，有一項「製造工藝門第五十三部第二百六十一類，天幕及其附屬品臥具吊床坐具可摺收之椅及

¹⁹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出品說明書〉，《直隸實業雜誌》，第3卷第7期（1914年），頁1-3。

²⁰ 提及蒙古包的清代使臣遊記，可參考張鵬翮，〈奉使倭羅斯日記〉，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頁31；延清，〈奉使車臣汗記程詩〉，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頁417；文祥，〈巴林紀程〉，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頁490；志銳，〈廓軒竹枝詞〉，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頁601。不過，以上遊記內對於蒙古包使用細節的描述詳細程度，遠不及嚴智怡團隊所撰寫的出品說明書。

²¹ 吳文藻，〈蒙古包〉，《社會研究》，第74期（1935年），頁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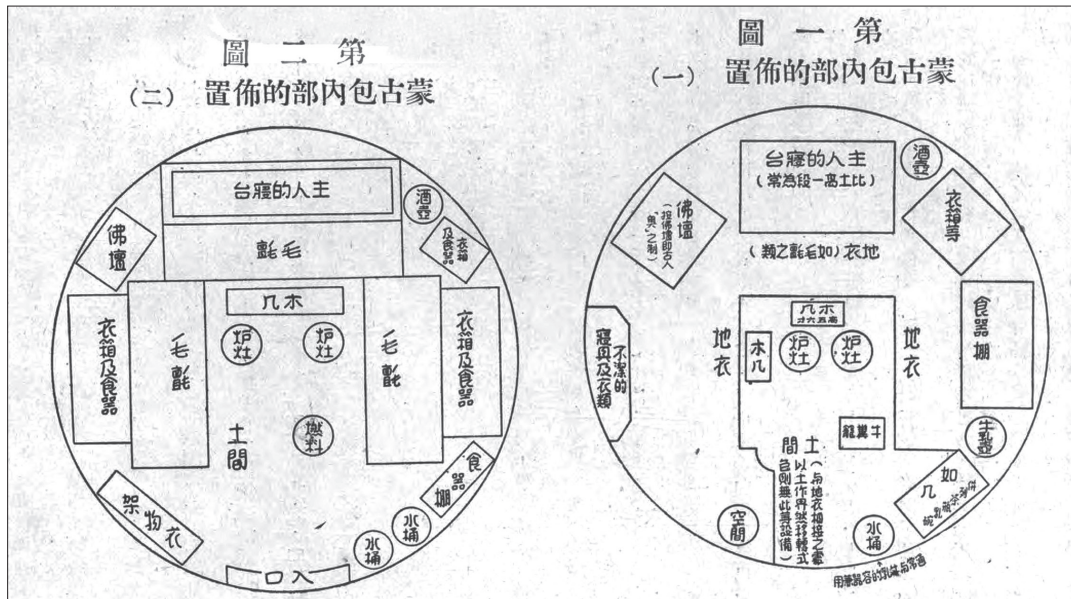


圖2、蒙古包室內配置陳設圖

資料來源：吳文藻，〈蒙古包〉，《中華雜誌（上海）》，第55期（1937年），頁28。

其他幕中家具及設備，可搬運之小屋。」²² 很顯然地，就功能而言，蒙古毡幕極為符合此類徵集品項之功能要求，一座能移動的帳幕小屋。

不過，除了符合賽品徵集項目的基本要求之外，還得是製作精良、優於他國的可移動小屋，在萬國博覽會有得獎潛力，直隸策展當局才值得大費周章投資運費使其赴美參展。針對蒙古包設計與製作的優越特性，在出品說明書中首先提

²² 〈專件：巴拿馬萬國賽會賽品分類目錄（續）〉，《直隸實業雜誌》，第3卷第1期（1914年），頁4。原文是“Department of Manufactures and varied industries, Group 53 articles for traveling and for camping. Class 261. Tents and Accessories. Beds’ hammocks, seat, folding chairs, and other camp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Portable houses.”見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ficial Classification of Exhibit Departments of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to be Held at San Francisco in the Year 1915 in Celebra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Panama Canal Opening, February 20, 1915, Closing, December 4, 1915* (San Francisco: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1915), pp. 20-21.

到「其屋為圓式覆毡，受力面小而具彈性，風濺之災皆可無患。又以毡之導熱散熱之力微，則冬免奇寒而夏免酷暑」，說明以毡為材料所製成的圓形小屋，可以抵禦蒙古草原的嚴厲氣候。接著具體描述蒙古包的設計細節，以木條為架構致使可以迅速搭建拆移、屋頂開天窗採光並製造室內空氣對流、因應室內狹小空間設計傢俱炊具（如煮食鍋具之鍋蓋可當作盛食之盤）、精美的花紋裝飾、簡易卻有效的運輸工具等等。簡言之，策展單位顯然對該展品之設計原理與製作過程經過細緻研究，並透過分析性的文字描述，呈現蒙古包的效能與實用性，以及適應嚴峻風土氣候的絕佳特性。在當時「適者生存」的種族演化理論架構下，能設計出蒙古包這麼有效且實用的移動屋，代表蒙古民族「思想之靈巧，精神之健全」，文明才能綿延並免於滅種之虞。既然蒙古民族是在長期種族演化機制下的勝利組，直隸策展單位進一步認為「具此數長，實為此民族之特殊用具，固有之文明，胡可不一為表揚之？」所以，一定要在世界博覽會場合上，「表揚」此民族成就，因為「吾省北部各屬皆蒙古舊壤，漢蒙錯處，仍主蒙俗。故蒙古關係於吾直尤切，當然負代為表揚之義務。」²³ 也就是說，蒙古民族的移動式優良家屋設計，值得在國際場合上「被表揚」，而可以代表蒙古民族表揚其文明成就的，表面上是來自蒙古的兩位出品人，但是，在天津展示現場，兩位蒙古族人在公園廣場上的蒙古包內生活了1個月，從主動的出品人，逐漸物化成被動的、被觀看的展示品。再者，因為參展經費不足之故，兩位蒙古出品人實際上並未隨著直隸參展團隊赴舊金山，因此以嚴智怡為首的「吾直」官方參展團隊，成為蒙古文明成就在巴拿馬賽會上的展示代理人，「有義務」在巴拿馬賽會上，「代表」蒙古民族向歐美觀眾「表揚」其文明成就。

嚴智怡團隊在其出品說明書中，雖然一開始強調蒙古民族素號強健，但是在說明書最後特別強調蒙古人的純樸善良，「蒙人性質樸實誠懇，行旅投之者無不接待殷勤，衣食無慮缺乏，其樸實誠懇之美風，誠足多者。」暗示漢人有責任在世博會上，向世界「表揚」這個純樸誠懇的蒙古民族。²⁴ 嚴智怡策展團隊對蒙古

²³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出品說明書〉，頁1。

²⁴ 事實上，蒙古人樂於接待行旅者，除了出於遊牧生活的社會支持慣習之外，亦有可能出於大清官方法律規定蒙古人民必須收容行旅者，「凡不容行人住宿致被凍死者額賠罰一九牲畜，未死者罰兩歲牛，若令歇宿其財畜被竊者，令家主賠補。」見〈不容行人住宿致被凍死〉，佚名撰，《蒙古律例》，卷10（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頁88。

文明與蒙古人性情特質的詮釋，在當時並非特例。例如1910（清宣統2）年隨肅親王善耆（1866-1922）出巡蒙古的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吳祿貞（1880-1911），留下重要的〈東四盟蒙古實記〉考察紀錄一文，根據《西北雜誌》上刊載的版本，提到「蒙人不知經商，故不知儲蓄耕種之所獲牲畜之所贏，只以謀一家之溫飽而已，即出其所餘補其不足，大率以物易物，尚不知銀幣流通之妙用」，而蒙人之愚昧源於無教育、無功名之獎勵、無文學之習慣、黃教之流毒。然而，即使蒙古人愚頑如此，而其原質固純淨有可導之資格，因為其有剛健之性質、服從之性質、信實之性質，仍然值得教化。²⁵ 也就是說，蒙古人雖然愚昧，但因為剛健、服從、信實等民族特質，可以透過漢人社會一貫的功名獎勵與文學教育，去掉蒙古政教合一的宗教迷信，即能「改造」蒙人，使之成為像漢人一般適者生存、符合天演的優秀民族。

直隸策展團隊對「蒙古毡房及用品用具」的展示策略，是將蒙古這個曾經叱吒風雲統治歐亞的族群，置於純真化、去政治化後的異族想像。不過，在舊金山巴拿馬賽會現場，除了直隸團隊提供的蒙古展件之外，還有另外一組藝術雕塑作品與蒙古有關，不過，卻再現了西方人眼中的蒙古鐵騎形象。巴拿馬賽會整個會場的中心為宇宙廣場（Court of Universe），廣場的東邊凱旋門為日昇門（Arch of the Rising Sun），上佇立一組雕像群，名為「東方國度」（Nations of the East）；西邊凱旋門為日落門（Arch of the Setting Sun），上佇立一組雕像群，名為「西方國度」（Nations of the West）。兩組群雕皆為美國當時著名的雕刻家們協力合作完成，每個雕像為真實尺度的兩倍大。「東方國度」雕像群象徵東方文明裡的各重要成員，從左至右分別為阿拉伯戰士（Arab Warrior）、黑人僕人（Negro Servitor）、騎駱駝者（Camel and Rider）、埃及人（Egyptian）、馴鷹者（Falconer）、代表印度文明而騎在象背上的東方精神（Spirit of the East）、佛教喇嘛（Buddhist Llama）、騎駱駝者（Camel and Rider）、穆斯林（Mahometan）、黑人僕人（Negro Servitor）、以及蒙古戰士（Mongolian

²⁵ 吳祿貞，〈東西盟蒙古實記（續）〉，《西北雜誌》，第1卷第2期（1912年），頁30-33。關於此文的書寫過程與版本問題，見忒莫勒，〈清末吳祿貞筆下的內蒙古東部社會及其籌蒙思想——以《東四盟蒙古實紀》、《經營蒙古條議》為基礎〉，《蒙古史研究》，第10輯（2010年），頁181-195。

warrior)。²⁶ 這個蒙古戰士身穿戰袍，肩上掛著一對長弓，揹著箭筒與一把大關刀，騎在英姿勃發緩步前行的駿馬上，這是曾經令歐洲聞風喪膽的蒙古鐵騎化身。（見圖3、4）屠坤華在其參觀巴拿馬賽會的《萬國博覽會遊記》一書中，將這件 Mongolian warrior 雕像描述為「鐵木真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戰士，蹂躪中原之韃靼種。」²⁷ 不管是入侵歐洲的 Mongolian warrior，或是蹂躪中原之韃靼種，蒙古人在東、西方歷史上曾經留下的記憶，迥異於20世紀初由直隸賽會事務局在國際場合上代為「表揚」其誠懇淳樸民風之「蒙古同胞」。



圖3、Nations of the East 東方國度雕塑群

資料來源：*Views of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San Francisco: Wahlgreen, 1915), p. 16.

²⁶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ficial Guide of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San Francisco: Wahlgreen, 1915), p. 52.

²⁷ 屠坤華，《萬國博覽會遊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頁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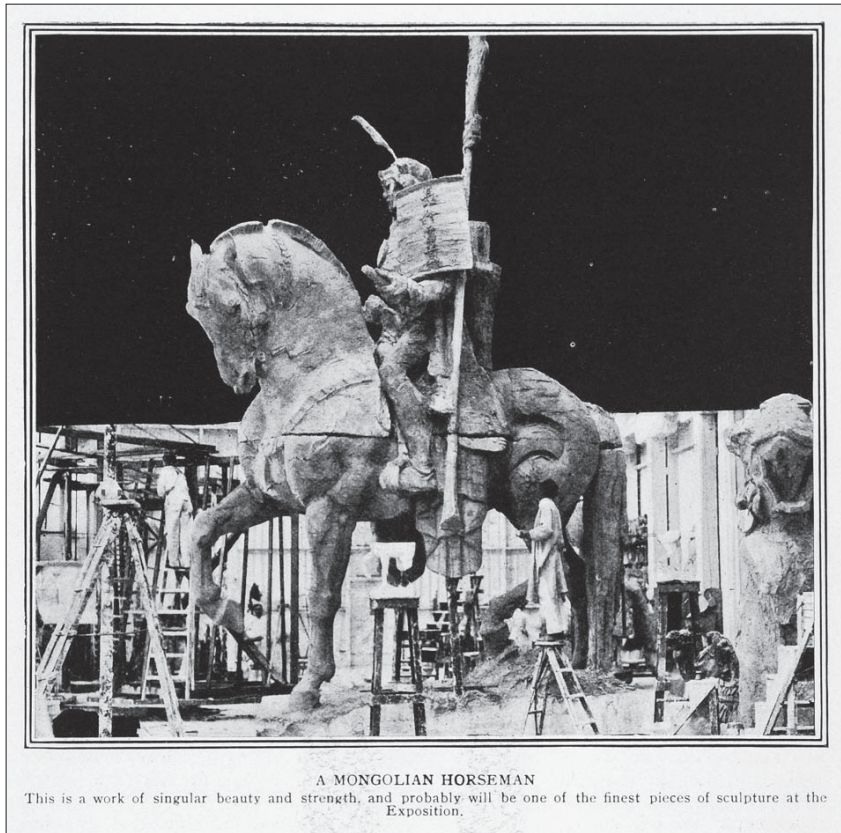


圖4、A Mongolian Horseman

資料來源：1914年巴拿馬賽會紀念印刷品，筆者自藏。

肆、「蒙古風景」開幕式

民國初成立，從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論述的轉換，政權的主導族群必須化解對境內其他族裔「殖民式統治」之指控，才有可能從過去的帝制邁向民主共和。但是，究竟什麼樣的族群關係，可以稱之為「共和」，而非「殖民」？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在1912年公布的「蒙古待遇條例」中明文規定「今後蒙古不稱為藩屬，與內地一律待遇，故政府對於蒙古行政機關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類之文

字」，但是，除了不使用特定政治修辭，如何在行政體系內各項決策裡，避免顯露出「統治者的驕傲」，讓「韃虜」成為「同胞」？回到「蒙古風景」的展示個案，究竟是在什麼樣的五族共和政治框架之下，蒙古民族慣用的移動式帳幕，被直隸官方作為展示品，向境內國民宣揚蒙古族的文明成就呢？我們可以回到天津公園裡「蒙古風景」展覽開幕典禮現場，來回答這些問題。

根據策展方對展覽現場的描述，此蒙古包外圍幕門處，樹立一方當時代表中華民國的紅黃藍白黑組成之五色國旗，5種顏色分別代表漢、滿、蒙、回、藏等5種民族，象徵五族共和政體。這面國旗，將天津公園現場的這個蒙古包，與其他日常生活使用之蒙古包，分疏出來，成為一個政治劇場，上演一段政治戲劇。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風景」是置於開放的公園廣場中央右側，與廣場左側餘興部並陳。餘興部是在預展期間，定期舉辦音樂會、魔術馬戲表演、武術表演、戲曲表演等的舞臺。與餘興部併置的「蒙古風景」，也是展期中的表演節目之一。餘興部展演天津自北洋新政以來的城市大眾娛樂，以及現代國民的生活風格（life style），是經過排練的表演；而「蒙古風景」則是將蒙古人不必排練的實際日常生活方式（way of life），予以劇場化。

1914年6月20日，整個巴拿馬賽會預展於天津公園正式開幕5天之後，事務局特別為「蒙古風景」，單獨舉行正式的開幕茶會儀式。嚴智怡等以主管身分，蒞臨蒙古毡，入幕，與兩位蒙古出品人，行相見禮，然後嚴被奉為首座貴賓，享用兩位蒙古出品人招待的奶茶與糕點。雙方致社交辭令，圖穆爾與車本感謝策展單位盛情邀約與款待，嚴智怡則感謝兩位蒙古人長途跋涉遠道而來參與盛會等等，最後車本進獻哈達給嚴智怡，拍照、兩位蒙古人在幕外送客。茶會結束次日，「蒙古風景」才正式開放各界觀眾參觀。整個儀式過程的直隸官方紀錄如下：

毡幕照料人圖穆爾、車本於昨日十二鐘三十分，特備茶點，敦請事務局長嚴君及諸執事，在毡幕內茶話。至時嚴局長偕各執事先後蒞幕，蒙人行相見禮畢。局長居首座，餘分坐左右，由蒙人進奶茶，復進糕點，殊為親敬。車本以蒙語致敬詞，由圖穆爾譯以漢語。略謂車本、圖穆爾呈貴局招致來津，復蒙貴局諸先生格外優待，與以居處，賜以衣飾，賜以飲食，車本等感謝之情莫可言喻，今敬備茶點聊表微忱。並云原擬治筵款待，惟有不便之處，尚祈恕宥。當由嚴局長答以本會開會，承兩君不

遠千里而來，辛苦勞瘁，出品來會陳列，增本會之光榮，輸社會以常識。本局長欣甚。今日五族共和，漢蒙一家，以後兩君事畢言旋，漢蒙當益親密，異日之攜手，則今日之會，實為嚆矢，是本局長之最希望者也。演說畢，復由車本以最尊貴之禮，跪進佛子哈達於嚴局長，由嚴局長接收，禮畢，由陳列所課員鄧子輔君拍照，拍後與辭，二蒙人在幕外請安致謝，大眾歡散而去。並聞以後會內將備蒙古毡幕照片為遊人入幕之券。²⁸

這段見面的談話紀錄，只有以上的官方記載，已經無從追溯車本究竟如何以蒙語表述。然而，從直隸事務局留下的紀錄來看，被事務局徵集員邀請來津的蒙古族人，被事務局「與以居處，賜以衣飾，賜以飲食」，給予出品補助，處於被上位者恩待的位置，呈現官／民之間的統治／被統治關係。同時，兩位蒙古出品人雖然暫時客居天津，仍能以蒙古包主人的身分，用蒙古傳統方式招待入幕之賓嚴智怡，某種程度上，呈現了漢／蒙民族之間互為主客的雙重關係轉換。而嚴智怡優雅的外交修辭，包括「今日五族共和、漢蒙一家」、「漢蒙當益親密」，表達了對未來繼續保持互為主客關係的希冀。

伍、「外蒙」究竟在何之外？

不過，在天津公園為期1個月的預展期間，這組置於廣場中央的「蒙古風景」展件，卻曾引起兩位參觀者嚴重不滿而向事務局提出抗議。對於此兩起抗議事件，事務局將官方的長篇回覆，刊載於《直隸實業雜誌》上，以解大眾疑慮。第一起抗議事件，牽涉蒙古與中華民國之間的行政治理權限，將在本節中陳述。第二起抗議事件，牽涉展示倫理，將在下一節中陳述。

原來在大清理藩院管理下因俗而治的外札薩克蒙古與內札薩克蒙古，在司法與行政系統上，都是屬於與內地概念相對的藩部，即內地的藩籬。清國對藩部只擁有宗主權，札薩克則握有盟旗的行政與司法權。然而，隨著清廷逐漸增加將軍

²⁸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會場大事記〉，頁8-9。

大臣與辦事大臣對蒙部札薩克的軍政監督考核之權，致使盟旗自治權日減。²⁹ 而且，清廷增派邊境駐軍以確立國界，致使內地與藩部之區分逐漸模糊，宗主權逐漸轉移成主權，清蒙關係因殖民、設官、駐軍等因素早已複雜且緊張。³⁰ 而中華民國繼承此複雜緊張的清蒙關係，雖然倡言五族共和使境內各民族權利、義務皆平等，但是如何取信並說服蒙古王公札薩克，的確是難題。再者，五族中的任何一族，若是只有部分族人來參與共和，而不是全體族人都成為中華民國國民，該如何解釋呢？五族共和下的「國家」與「族群」想像邊界，是否必須完全一致？如何用政治話術，化解「族界」可能溢出「國界」的危機？

一位署名為行吟先生的參觀者，在看完「蒙古風景」的展示說明之後，寫了一封信函給主辦單位，抗議在展件說明中只標明內蒙古，而未出現外蒙古，極為不妥，觸動了蒙古欲獨立於中華民國之外的政治敏感神經。因此建議主辦單位宜全面改為蒙古，否則「至恐一般國民因敝會之說明，認外蒙為已亡。」³¹ 亦即，要求主辦單位去掉內蒙古之字眼，全面稱之為蒙古，以免坐實了中華民國已喪失外蒙的事實。

針對此一抗議，直隸官方全文回覆如下：

行吟先生鑒：昨日下午接奉華箋，愛國熱忱溢於言表，敝會不勝欽佩之至。惟承指示內蒙古之內字及地名，似宜不用，即渾而言之曰蒙古，以取概括一節，未免猶有誤會之處。按蒙古幕後張貼之簡要說明，所指吾省北部綏東、赤峰、林西、開魯、多倫各屬，皆為內蒙舊壤，係言以上各處，昔皆內蒙區域，今日皆設縣治，綏東赤峰等處皆係現在縣名。至各縣所在之內蒙旗名，則為奈曼、翁牛特、巴林、東西扎魯特、阿魯科爾沁、察哈爾等處。蓋吾直北部漢蒙雜居，本無天然界域。漢官之行政，北以無漢人足跡處為止。蒙王之理事，亦南以無蒙人居止處為止，例如喀拉沁王府，乃在平泉縣界內，而其北尚有赤峰、林西等縣，遠出

²⁹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頁71-81。

³⁰ 張啟雄，〈「獨立外蒙」的國家認同與主權歸屬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頁288。

³¹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展覽會中之言論〉，《直隸實業雜誌》，第3卷第7期（1914年），頁7。由於官方紀錄只留下直隸事務局的回覆，未留下行吟先生的抗議信全文，筆者在此只能就直隸事務局的回覆，逆推這位行吟先生抗議信的可能內容。

千餘里，仍為漢官行政之區，赤峰縣之本街本為翁牛特地，街內既有縣行政公署，又有蒙王局所分理漢蒙各事。近年漢蒙融洽，兩面界域已然消化無痕。敝會為直隸出品協會徵集出品，自以本省為限。此毡幕本為蒙古物事，而鄙局代為徵集，正因綏東各縣，係內蒙舊區，現猶兩族雜處之故，是以於簡要說明內特表出之。足下前言之責，諒以綏東等縣名，認作內蒙旗名解釋，且以不列外蒙旗名，為默認外蒙已亡之證。殊不知敝會權限所在，徵集品之不及外蒙，亦與不及他省相同。至恐一般國民因敝會之說明，認外蒙為已亡一層，似可勿庸過慮，雖然足下之留意時事也如此，熱心愛國也如此，敝會同人等甚表同情，以後有何高見，尚希隨時賜教為幸。³²

這座蒙古包應是從直隸省綏東縣境內徵集而來的，而綏東縣的行政區域，與盟旗的行政治理範圍有所重疊。直隸事務局特別強調，綏東是屬於漢官行政系統下的縣名，而非蒙王治理系統下的旗名。也就是說，當時在漢、蒙混雜的區域，有漢、蒙兩套行政系統並行，各自治理各自的族人，漢官治理漢人，蒙王治理蒙人。而直隸事務局權限僅止於直隸省境內，因此不可能徵集到外蒙的展品，因為對直隸省而言，外蒙是直隸省之外，但是外蒙是不是中華民國之外，這當然不屬於直隸省能單方面界定的了。而這位行吟先生所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取消大清時期內、外蒙古的區分，一律統稱蒙古，作為解決蒙古問題之消去法政治話術，只要中華民國將蒙古族人不分內、外全數納為國民，似乎就可避免蒙古獨立問題。

雖然直隸事務局的正式回應裡，是就該局實際行政權責之所及，將外蒙以「他省」作為對照，來緩和行吟先生所提之爭議，但是對於已宣稱獨立的大蒙古國（即「外蒙」），直隸事務局應視之為尚未建省的「他省」，還是已經宣稱獨立的「他國」，反映了當時中華民國的嚴重主權危機。或許正因為如此，為了展示漢蒙一家，直隸事務局邀請的蒙古出品人之中，車本來自外蒙古，圖穆爾來自內蒙古，並且擔任中國與外蒙之間的翻譯（協調）者，以世界博覽會的展示平臺，向蒙王並國際社會（特別是俄國）宣告，外蒙古仍是五族共和之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³²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展覽會中之言論〉，頁6-7。

陸、是「五族共和」？還是「人種展示」？

從世界博覽會的脈絡而言，精緻的蒙古毡幕作為移動式家屋，對習慣於磚木造建築的漢人策展團隊而言，的確是新奇的，也因為新奇，所以值得推向世界博覽會。因此，直隸事務局邀請兩位蒙古人從綏東遠道來至天津公園，假想這個濱海城市內的公園為蒙古大草原，住在自己帶來的帳篷裡，假裝過著在大草原上與駝羊為伍的生活，「表演」1個月的漢蒙一家。

雖然直隸官方以直隸境內一部分國民之生活、五族共和等政治修辭來詮釋「蒙古風景」展件，然而，從世界博覽會的展示政治脈絡而言，以真人與其原生文化物件並置的展示手法，卻是殖民母國對殖民地原住民進行的「人種展示」（human zoo），因此引發了天津預展上一位參觀者的強烈抗議。根據〈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展覽會中之言論〉一文的記載：

本會佈置蒙古風景，有一時裝少年熱血唵涌，憤然作色問於佩月色徽章之執事曰：「惡用是。予游博覽會多矣。如日本博覽會之臺灣館、蝦夷館，荷蘭博覽會之南洋館等，莫不盡態極妍，形容其屬地土人生活程度若何之野蠻，表示其母國任令若何苛刻，不得謂之虐。我國之蒙古，係五族共和之一，亦同胞兄弟也，何忍列之賽會場，以招外人之訕笑乎。速撤去速撤去，勿貽吾大國民羞……。」³³

從直隸官方留下的這則紀錄來看，這位時裝少年抗議者認為，野蠻土人的人種展示是為了合理化苛刻的殖民主義，但是蒙古之於中國，是五族共和政體下權利、義務平等的組成民族，與漢人是同胞兄弟，並非被殖民的野蠻土人，因此，這個蒙古風景展示不符合中華民國的政治現實狀況，應儘速撤去，否則會羞辱所有中華民國國民。

很顯然地，這位時裝少年所提到的兩個博覽會人種展示，一是1883年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辦的「殖民萬國博覽會」（International Colonial and Export Exhibition in Amsterdam），是歷史上第一個以「殖民」為主題的萬國博覽會，

³³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展覽會中之言論〉，頁5。

將爪哇與蘇門答臘的整個村落建築並當地村民，運到阿姆斯特丹展出。³⁴ 至於日本的世界博覽會人種展示，可能是1903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展出的臺灣原住民；1912年東京「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中展出的臺灣原住民與北海道愛奴族；或者是1914年4月，日本東京舉辦的大正博覽會，此次日本對殖民地原住民展示大量增加，包括樺太館、滿洲館、拓殖館、朝鮮館、南洋館、臺灣館等等。³⁵

這位時裝少年之所以對同胞兄弟被直隸官方（自己人）進行人種展示反應如此激烈，應該或多或少與1903年日本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有關。透過中國留日學生的披露、誤譯、延伸詮釋，中國媒體大幅報導日本將設「人類館」，館內要雇用北海道愛奴族、臺灣之原住民、琉球、朝鮮、支那、印度、爪哇等不同人種，以真人實物展示「惡風蠻習」。這些報導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因為將高貴的「支那人」與如牲畜般的、世界最低等民族共同展示，引發中國人長久以來的「野蠻情結」，這「野蠻情結」包括3個面向，一是中國一直被「野蠻人」入侵；二是「中國人」今日竟然被過去以天朝馬首是瞻的「倭奴」歸類為「野蠻人種」，實為奇恥大辱；三是「中國人」之中的確有一部分人的落後行為與習俗符合野蠻人的標準，文明高貴的中國人應該與其切割，包括抽鴉片的人、裹小腳的女人、以及「滿洲人」。³⁶ 若不與之切割，按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主義來推測，會招致中國的「亡國滅種」。「學術人類館事件」是1903年時的爭議，反映當時滿清政權與漢人革命黨成員之間的激烈矛盾。而1903年時，嚴智怡剛好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就讀，對此事件應不陌生。

對直隸策展團隊而言，「五族共和」才是「蒙古風景」展件的主要論述，並非赤裸裸的「殖民」。然而，在1914年，哪個族群最迫切需要先被中華民國「共和」之？畢竟直隸境內除了漢人、蒙人之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滿人，以溥儀為代表被「軟禁」在紫禁城內，暫時還未出現滿洲獨立的危機，中華民國先不急著

³⁴ Marieke Bloembergen, *Colonial Spectacles: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at the World Exhibitions, 1880-193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0-105.

³⁵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頁210。

³⁶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探討〉，《新史學》，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07-163。

「共和」滿人，因為多數漢人認為滿人已被漢化，對「五族共和」暫無威脅。但是，蒙族尚未漢化，而且在溥儀把政權和平移交給中華民國之前，大蒙古國就已經宣布獨立了，中華民國因此勢必努力「共和」蒙古。

針對這位時裝少年抗議者提出的觀點，直隸策展官方回覆如下：

配月色徽章之執事曰：「君言誠是，君誠愛國者。但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論也。短視者，莫不是己而非人，識淺者，莫不是同而非異。今日理學發明，是非皆有一定之標準，不能以意為之也。中儒有言器無美惡，宜人者良。西儒有言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所謂宜所謂適者安在？當以能戰勝天然力為斷也。客以其屋之圓而毡製為劣乎？不知蒙古之地位，冬多風而夏多電，冬奇寒而夏盛暑。試問其家屋果何制，方能抵抗此等氣候乎？以物理原則推之，圓者受力之面小，方者受力之面大，蒙古冬日之風最巨，以抵抗風力故，其必以圓式為宜也。毡之導熱力，較木為緩，覆屋為毡，雖互寒而散熱之力緩，雖酷暑而收熱之力微，故又以毡為宜也。……且其人格賦性懇樸，素不相識者投之，亦必供之飲食款待周至。此推食解衣之風，在近世風氣澆薄，通都大邑所不多見者，竟於蒙古見之，以上非其固有之文明乎？況夫蒙古居世界強健民族之一，而為組成吾中華民國之一族，其固有文明特優之點，吾中華民國不為之表揚，其誰為表揚之？此中國所必以此為出品也。而直省北部各屬，昔蒙古之舊壤，至今習俗半仍其舊，關係最為密切，實負有徵集代為表示之義務，此吾直省所以徵為出品之理由也。」佩月色徽章執事之言止此，少年始憤然繼慄然，終乃肅然曰：「吾過矣吾過矣，從此不敢藐視吾蒙古同胞矣。」³⁷

策展官方首先澄清，蒙古人並不野蠻落後，居住於「蒙古包」亦非野蠻落後之表徵，這個展覽要呈現的是蒙古民族適者生存的成功策略。首先，從「科學」（物理原則）的角度，確認蒙古民族為了適應塞外風土環境，而創造出特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物件，是「進步」之象徵。而蒙古人通過嚴苛的物競天擇考驗，卻仍不驕矜，反而「人格賦性懇樸」，仍保有通都大邑中已經罕見的「推食解衣之風」，正是文明的特優之點。具有以上健全人格與科學發明能力之蒙古

³⁷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展覽會中之言論〉，頁5-6。

民族，因此成為「世界強健民族之一」。而蒙古民族已成為「吾中華民國」之一族，「吾中華民國」必須表揚「其固有文明特優之點」，否則「其誰為表揚之」？因此，「中國所必以此為出品」，否則蒙古優越文明可能被俄國表揚之，或者被大蒙古國表揚之。

事實上，在舊金山巴拿馬賽會上，觀者還是可以看到所謂「野蠻落後中國」的展示。在博覽會娛興區 Zone 的 Underground Chinatown（地下唐人街），由當地商人提供舊金山市區中國城的鴉片館、賭場、妓院、械鬥場景等模型，展演華人移民所代表的傳統中國地下社會之負面形象。此 Underground Chinatown 所再現的，其實一部分是美國社會對華人移民的排斥與恐懼。但是嚴智怡並未意識到華人移民在美國倍受歧視的處境，在其參觀日誌中，反而將 Underground Chinatown 翻譯成更具驚恐意象的「中國地獄」，並認為「美洲華僑，吸煙賭博實占多數，無怪人之厭棄也。」³⁸ 嚴智怡的此種態度，頗符合楊瑞松所分析的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之「野蠻情結」，反映文化縉紳慣常對下等社會的階級鄙視，也是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亟欲與之切割的那個「野蠻落後中國」。對比之下，或許我們可以相信嚴智怡團隊對「蒙古風景」的真人展示之辯護，的確並非出於殖民者鄙視「蠻夷」的態度，而是出於某種將蒙古人視為「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的理想化典範。

直隸策展團隊強調以「共和中國」的身分參與巴拿馬賽會，極力擺脫「大清國」的形象，因為大清國是曾經「奴役」漢、蒙、回、藏各族的專制政權，而「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是要追求民族平等，保護每個境內族群最大益處，表揚境內各民族之文明成就。只要組成中華民國的各族群，都是強健且適應力佳的民族，中華民國勢必也是強健進步的國家。而且，直隸策展官方特別強調蒙古族的好客懇樸，而非強悍矯健，也在某種程度上向國際社會表明，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即使加入了過去曾令周邊族群聞風喪膽的鐵騎民族，必然仍是個「禮義之邦」，不會成為掠奪的殖民主義者。

「蒙古風景」這類以真人公開展示境內一部分國民之生活的做法，是漢人對

³⁸ 嚴智怡，〈預會志略〉，收入氏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2卷（天津：直隸實業廳，1921年），頁29。

境內其他民族進行文明成就分級，以人種展示的方式，「表揚」並「保護」境內「純真善良」的族裔，以完成五族共和的國族想像。若在大清帝國時期以朝貢運作的國際關係思維之下，大概不會出現，至多是以職貢圖系統下的圖像再現，記錄大清皇帝接受藩屬國進貢。³⁹ 進貢之屬國不是以「文明成就」為標準進行分類，而是與天朝的親疏關係做為分類標準。大清帝國不需要在國際場合上，「代為表揚」臣服於天朝之下的某個藩屬國，藩屬國無法代表天朝，天朝亦無法全權代表任一藩屬國。朝貢系統是一種外交的臣屬與合作防禦關係，而非殖民關係。但是進入漢人主導的民國時期，滿、蒙、回、藏各族，其實無法與漢人平等分享屬於「中華民國」的政治權力。強調五族共和的直隸事務局策展團隊，雖然不採用西方殖民主義的人種展示，將被殖民者再現為野蠻土人；但是，直隸事務局用人種展示手段，將正在尋求政治獨立的蒙古族群，再現為純樸的「高貴野蠻人」，需要「吾中華民國」保護與表揚。

柒、「全國教育展覽會」上的「蒙古生活及教育」

儘管「蒙古風景」作為1914年直隸參與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的展示品，曾經引起人種展示倫理的爭議，但是，在展示語言上是直白而優雅的，不管是漢蒙之間互為主客關係，或是在國際上表揚「高貴的野蠻人」，「蒙古人」被直隸策展方明確展示出來並正面論述之。相對而言，當中華民國文化官僚愈來愈嫻熟族群文物展示的操作，並且知道如何避免政治不正確的展示爭議，逐漸將「被展示的他者」，轉為「不在場的他者」。原本可以明確辨認出來的「蒙古出品人」，在展示中不再被明確標籤化，改以協會組織名義或漢化姓名，隱身在策展行政團隊中。

1924年7月，由中華教育改進社發起，東南大學教育科主辦的「全國教育展覽會」上，陶知行主導的「蒙古生活及其教育組」，籌劃了一個小規模的靜態展示區——「蒙古生活與教育」，展品包括蒙古文的教科書、教育統計圖表，以及

³⁹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2012年3月），頁1-76。

蒙古日常生活實用器物，包括宗教器物與衣飾。（見圖5）「全國教育展覽會」展期只有1週，自1924年7月3-9日，地點在南京東南大學體育館，整個策展總經費約為1,000元，徵得展件超過3萬件，參觀票價為銅元5枚，展覽參觀人數總共約兩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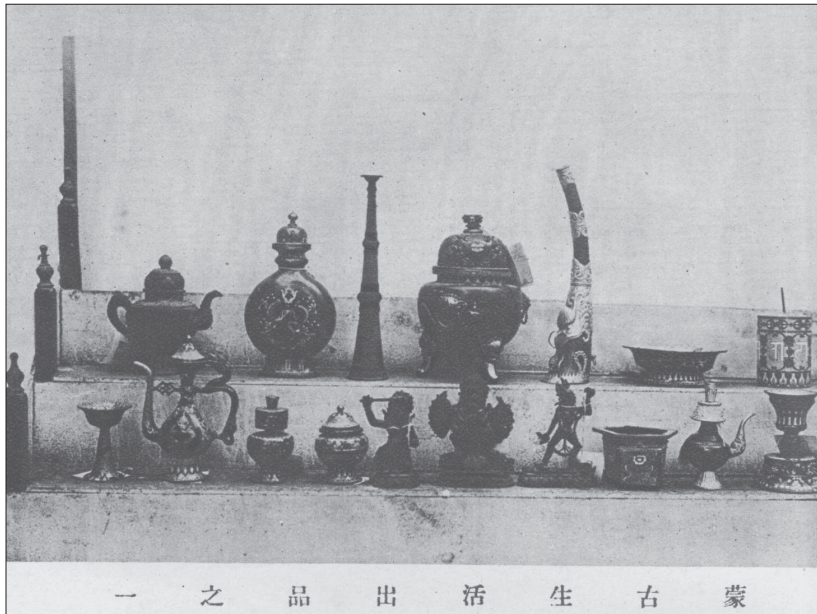


圖5、「蒙古生活與教育」展示陳列圖

資料來源：〈蒙古生活出品〉，《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頁14。

中華教育改進社乃實際教育調查社、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編輯社等3個社會團體合併而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改革浪潮下新教育運動的推手，於1921年12月23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核心董事成員大部分為留美歸國學者，包括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陶知行等人。陶為主任幹事，主掌整體社務運作，並聘請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與孟祿（Paul Monroe, 1869-1947）為名譽董事。⁴⁰ 整個改進社的緣起，是因為「自辛亥那年變更國體，雖然掛著一塊共和

⁴⁰ 楊蓮，〈陶行知與中華教育改進社〉，《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1期（2008年1月），頁22。

「蒙古風景」?: 五族共和下被展示的他者

招牌，而一般國民的頭腦，仍是數百年前之舊」，因此欲透過實地調查各種教育狀況、依據實際問題研究解決方法、輔助個人或機關對於教育之實施或改進、編譯關於教育之書報、提倡教育事業之發展及學術研究等具體手段，推動新教育運動。⁴¹

全國教育展覽會是中華教育改進社主辦之第三屆教育年會的相關活動之一，雖然策展預算只有1,000元，卻是極複雜龐大的展覽，整個架構是新教育事業的過去、現在實際情況及未來的可能發展。展示物件包括各式圖表、統計資料、出版圖書、教具實物模型、教學成果報告等。除了展覽之外，還有各組的教育研討會議，會議討論結果完整發表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發行的《新教育》期刊上，是結合理論研究並實務的教育大展。整體「全國教育展覽會」的策展組織架構整理如表1。⁴²

表1、1924年全國教育展覽會籌備組織架構

展覽會組織	徵集展品	組負責人
教育行政組	教育機關組織及行政辦法之統計圖表。	程湘帆
高等教育組	各高等學校校史、教職員統計資料、學生統計資料。	郭秉文、任叔永
中等教育組	學校行政統計、學生生活、學生成績、學校設備。	廖茂如
師範教育組	學校行政統計、教務資料、學生成績、訓導資料、校舍硬體設備。	汪典存
小學教育門	設備、教學與訓育報告、統計資料。	俞子夷、吳研因
幼稚教育組		陳鶴琴、甘夢丹
鄉村教育組		華伯雄
童子軍教育組		張信孚
義務教育組		袁希濤
兒童玩具組	商務書館出品之物。	陳鶴琴

⁴¹ 汪懋祖，〈中華教育改進社緣起及章程〉，《新教育》，第5卷第3期（1922年），頁343-346。

⁴² 夏承楓，〈全國教育展覽會籌備紀略〉，《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頁909-965；〈全國教育展覽會開幕紀〉，《聖教雜誌》，第13卷第8期（1924年），頁329-332。

展覽會組織	徵集展品	組負責人
教育經費組		程其保
中等學校心理儀器組	東大各種乾電池測驗器。	陸志韋
學校訓育組		鄭曉滄
教育統計組		朱君毅
衛生教育組		胡宣明、趙士法
教育書報組	國內外之教育書報。	鄭曉滄、張叔良
特殊教育組	美國盲童教育書籍工具。	
農業教育組	動植物標本。	鄒秉文
職業教育展覽部		中華職業教育社
平民教育展覽部		江蘇平民教育促進會
科學教育展覽部		中國科學社
圖書館教育組	圖書館建築模型與照片、圖書館內部設備模型、印刷物樣本、外國裝訂書籍、中國裝訂書籍、書庫模型、書庫照片、圖書借閱辦法、圖書目錄排列法、圖書館學書籍、文津閣善本書。	洪範五
學校建築組		茅康臣
科舉教育組	前清科舉時代考舉所用之物。	湯肅如
青年會教育組		劉湛恩
美育組	美術科系或課程之學生創作品。	劉海粟、周玲蓀
國畫組		呂鳳子
蒙古生活及教育組	蒙古文字書籍及鉛字。	陶知行
南洋華僑教育組	新加坡端蒙學校之水彩畫、道南學校美術炭畫、華僑中學油畫、檳榔樹等植物標本。	趙厚生、劉虛舟
日本教育組	日本教育行政組織、經費統計、成績、校舍模型照片、教學法、教具、教科書、教育書報、體育與衛生教育、美育、文具、有美術價值之瓷器貨樣與製造歷程、兒童玩具、教師生活、農村生活及農村教育照片。	

資料來源：夏承楓，〈全國教育展覽會籌備紀略〉，《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頁909-965。

「蒙古生活及教育」展件的負責人是陶知行，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教育》雜誌的主編，是中國現代平民教育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其「五族共和」論述主張，以「平等」為最高原則，倡言廢除社會階級與族群階級。就「共和」而言，是要以平民教育為手段培養公民意識，廢除封建專制打破族群內的社會階級差異，因為「中華民國而不能廢除內蒙王公，解放內蒙奴才，不但是有違共和政體，簡直大背人道了。從一個專制的內蒙變到一個自治的內蒙，固要運用政治的方略，但最要緊的還是要從培養領袖訓練公民入手。」而針對「五族」關係，他反對殖民與武力征服，倡言「共和不忘自治，自治不忘共和」，主張「中國應設聯邦政府，內蒙應作這聯邦政府之一邦。我們不但應當如此看待內蒙，凡和內蒙具有同樣特性的區域都應當如此辦理，方能鞏固五族共和的基礎。外蒙既已自建國民政府，內蒙又起而要求自治政府，我們還能不警醒嗎？」⁴³

陶知行推動蒙古平民教育的理念，詳細描述在其〈五族共和與教育者之任〉一文中。他認為「五族共和不是空談所能收效」，也不是「武力所能建設」，「武力派與殖民法派有一個根本的錯誤。……他們不把五族通盤打算，只是在那裡為一個民族打算。」⁴⁴ 在武力與殖民皆無濟於五族共和的理想政治下，陶知行認為唯有「建築四通八達的道路」與「實行四通八達的教育」，使五族國民在物質與精神上相互溝通，才有可能落實「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因此，他要用教育「使五族的人同受中華民國化，同受五族共和化」，並且以民族自決為前提訂定蒙古教育方針，「即不為一民族打算，乃為蒙古人而辦蒙古教育，非為漢人而辦蒙古教育，非為教育界開新天地占蒙古地盤，乃幫助蒙人，又當為五族共和辦蒙古教育。蒙古教育正在萌芽，故必創造國家之共同觀念，將來成為聯邦更好，即使不成，亦屬友誼必要。」⁴⁵

在陶知行主導的「蒙古生活與教育」展示區，包含101件（組）展品，當中日常生活物件、衣飾與飲食等占16件，藏傳宗教器物占32件，照片156張，地圖4

⁴³ 陶知行，〈內蒙革命與教育〉，《新教育評論》，第1卷第4期（1925年），頁3-5。

⁴⁴ 陶知行，〈五族共和與教育者之任〉，《申報：教育與人生週刊》，第22期（1924年3月17日），頁237。

⁴⁵ 夏承楓，〈學術會議記錄〉，《新教育》，第9卷第3期（1924年），頁437。

幅，36種書籍出品，書籍裡包含蒙古史籍類、調查遊記類、蒙文教科書、日本與俄國出版物等。展品選擇的標準，是要符合該屆年會會議討論通過的四項蒙古教育方針，包括養成五族共和的公民資格、培養蒙賢治蒙人才、保持蒙古民族之獨立性並發展其優點、依據現在生活之狀況，圖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等。⁴⁶ 根據策展單位的報告，將展件分類整理如表2。

從表2的展品細節來看，陶知行策劃的「蒙古生活及其教育」展區，所謂「蒙古生活」的部分，是以蒙古族人當時全套的藏傳佛教儀式法器，與日常穿戴的衣帽鞋等作為代表。而「蒙古教育」部分的展品，則是以中文書寫或譯自俄、日文的蒙古歷史專書、當代蒙古地理調查報告、蒙漢對譯四書五經、蒙文印刷教科書等。展示的方法，是將所有物品依照使用場域劃分，羅列放置在展臺上，如人類學調查採集而來的標本展示一般。和嚴智怡團隊所策劃的「蒙古風景」展件比較，「蒙古生活及教育」展中，生活與教育的主體——「蒙古人」，不再實際出現於展場；取而代之的，是蒙古人日常食品、衣飾、兒童玩具等物件，以及較完整的佛教用品，並用大量照片影像再現其實際生活樣態，用書籍呈現策展方認可的蒙古教育內容。

不同於教育展上其他展件主要由各學校教育機構提供，「蒙古生活及教育」展件出品人，是北京的籌邊協會（74件）、汪印侯（15件）以及主辦單位中華教育改進社（12件）。在出品人名單中，籌邊協會提供了超過一半的展品，包括全部的宗教類器物、大半的照片，以及絕大部分的書籍。籌邊協會於1924年成立於北京東城大佛寺，但在本次展示結束之後，似乎便停止運作，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因此暫時無法釐清此組織的成立細節與主事者，但此協會勢必與主辦單位中華教育改進社有密切合作關係。⁴⁷

⁴⁶ 〈分組會議議案彙錄——蒙古教育組〉，《新教育》，第9卷第3期（1924年），頁547。

⁴⁷ 房建昌，〈簡述民國年間有關中國邊疆的機構與刊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1997年2月），頁94。

表2、「蒙古生活與教育」展示區之展品分類

展件分類	項 目
飲食品類 (7件)	奶餅、黃油、炒米、炒麵、奶皮、奶豆腐、磚茶。
用具類 (4件)	刀箸、火襖帶、食用筷刀、取火具。
衣飾類 (3件)	帶環、帶輪、蒙古香牛皮女靴。
兒童玩具類 (2件)	蒙古打骨拐、蒙古象棋。
宗教類 (32件)	紫銅佛閣、白銅佛閣、白銅淨水盆、紫銅淨水盆、奔巴瓶、淨水壺、扁淨水壺、大扁水瓶一雙、淨水盞、淨水盆、小竦、曼布拉碗、海燈1對、藏香瓶、花盆1對、大香爐1對、然布魯鼓、曼達、小喇叭、法輪1對、岡竦1對、畫佛像3架、喇嘛涼帽、黃色外套、黃色大袍、硬領、雞冠式藏帽、僧披、念珠、大香爐、蕃佛3尊。
畫圖類 (4件)	蒙古房室弓箭圖、蒙古全圖、蒙古臺站圖、蒙古地圖。
照片 (13件共156張)	蒙古婦、庫倫景片、恰克圖王公片、佛像照片、外蒙景片、活佛實景、二次除消獨立外蒙王宮片、蒙古人片、蒙古風景與生活之照片1冊、蒙古生活照片四橫幅55張、蒙古生活照片甲組44張、新蒙古照片12張、蒙古生活照片乙組30張。
書籍類 (36種)	<p>紀要史略：《內蒙紀要》、《蒙古史》、《東蒙牧畜》、《滿蒙皮革工業》、《綏區婚喪禮俗記》、《蒙古及蒙古人》、《自治外蒙古》、《外蒙近世史》、《蒙古鑿》、《新蒙古》。</p> <p>調查遊記：《察區牧畜調查記》、《烏蒙調查記》、《河套調查記》、《外蒙西部遊歷談》、《外蒙農業調查記》、《外蒙礦物調查記》、《後套實業調查記》。</p> <p>蒙文書籍：《蒙文字母》、《藏漢合璧三字經》、《蒙漢千字文》、《蒙漢大學》、《蒙漢中庸》、《藏漢合璧孟子》、《漢蒙國文教科書》、《蒙漢合璧漢語入門》、蒙文鉛字一匣、《蒙文鉛字說明書》、《蒙古雜字》、《蒙文五方原音》、《蒙文教科書》。</p> <p>日本書籍：《日文蒙古軍紀》。</p> <p>俄國書籍：俄國蒙文鉛字雜誌。</p> <p>其 他：《松塢草堂藏書目錄》、《西北半月刊》、《後套實蒙計劃書》、《蒙藏院統計》。</p>

資料來源：張繩祖，〈蒙古教育組報告〉，《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頁1091-1094。

出品人之一的汪印侯，提供了所有食品、生活用具、衣飾、玩具，以及《蒙文五方原音》、《日文蒙古軍紀》兩部書。汪印侯，即特睦格圖（1887-1939），漢名汪睿昌，字印侯，是喀拉沁旗蒙古人，受親王貢桑諾爾布賞識，1903年留學日本習軍事與醫學，是民國初期活躍於北京與南京的蒙古知識分子，精通蒙、漢、藏、滿、日、俄等文，從事許多翻譯工作。他自創了一套蒙藏文鉛字印刷術，取得中華民國專利權，1923年在北京創辦蒙文書社與印刷廠，大量印製蒙藏文圖書。⁴⁸ 因此，展示的蒙文書籍，特別是蒙文鉛字一匣、《蒙文鉛字說明書》、《蒙古雜字》、《蒙文五方原音》、《蒙文教科書》等，應該都是汪印侯蒙文書社的產品。⁴⁹ 蒙文鉛字印刷術其實早已存在，但主要技術研發者是歐洲傳教士、俄國人與日本人。中華民國若要利用蒙文印刷品達到「五族共和」之目的，勢必掌握蒙文鉛字印刷術，因此1930年汪印侯獲聘為教育部常任編審，其蒙文書社亦為教育部印製蒙文教科書的固定合作出版社。⁵⁰

如果直隸巴拿馬賽會預展上的「蒙古風景」出品人車本與圖穆爾，是來自蒙古、可代表蒙古大眾的文化生產者，那麼，做為「蒙古生活與教育」展的出品人汪印侯，則代表少數活躍於國民政府的親中蒙古知識菁英，是文化生產者，也是個幕後的翻譯者，負責生產漢、蒙之間互為主體的翻譯媒介，以促成「自己人教育自己人」的民主自治。在此展示中，蒙古生活的主體「蒙古人」，可就教育啟蒙程度，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已經先行啟蒙完成的蒙古知識分子，並可擔負其他蒙古大眾之啟蒙教育者，如汪印侯；第二類是等待啟蒙的「被教育者」，教育的內容除了蒙古在地知識外，還包括翻譯成蒙文的四書五經等傳統中國典籍。

根據全國教育展覽會期間同時舉辦的研討會紀錄，1924年7月4日通過「在內地舉行蒙古生活展覽會，在蒙古舉行內地生活展覽會」之議案。⁵¹ 也就是說，蒙

⁴⁸ 關於汪印侯生平，見嘎爾迪，〈蒙古翻譯家、出版家特睦格圖及其歷史貢獻〉，《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98年1月），頁63-64。

⁴⁹ 但是在報告書中，這些物件的出品人是籌邊協會。推測可能籌邊協會向蒙文書社購進的商品，之後納入展示。見張繩祖，〈蒙古教育組報告〉，《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頁1091-1094。

⁵⁰ 關於蒙文書社的歷史，見多捷、忒莫勒，〈民國年間蒙古族出版史事考辨〉，《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99年2月），頁112-118。

⁵¹ 〈分組會議議案彙錄——蒙古教育組〉，《新教育》，第9卷第3期（1924年），頁543。

古人及其生活物件不只是被展示的客體，同時蒙古人亦有機會成為觀看的主體，檢視內地漢人的生活物件。然而，隨著1928年之後中華教育改進社暫停社務，致使在蒙古與內地持續辦生活展覽會的提議從未實現。⁵²

捌、西北文物展覽會

1936年在南京國貨展覽館舉辦的西北文物展覽會，是1928年南北統一後國民黨主政以來，推動「開發大西北」政策的成果展，由開發西北協會、新亞細亞學會與西北問題研究會等3個組織共同發起，馬鶴天、郭維屏、董道寧是主要展覽籌備人，總策展經費約兩萬元。籌備期間約兩年，從1934年7月開始，直至1936年6月14日在南京國貨展覽館正式開展，歷次籌備會議紀錄皆即時刊載於《西北問題季刊》1935年第1卷與第2卷內。在第十六次籌備會議上，陳立夫提議徵集物品目標如下：

1. 能激發民眾之民族意識者，如古代雕刻用具。
2. 能代表西北之特長者，如皮毛、農產品、交通工具。
3. 能使民眾知西北急需努力進行者，如開渠、造林等工作之照片及影片模型。

同時，郭維屏提議上海美專學生國難宣傳團所得物品亦應請其加入本會展覽。⁵³ 簡言之，「國難」、「民族意識」、「開發西北」等關鍵詞共同成為此次展覽的基調。展品的主要供應者包括居國民黨要職的個人（如邵元冲提供了近250張的攝影照片）、中央政府所贊助的研究單位（如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學考察團等）、邊疆各省地方行政機關，以及在西北地區的漢人商會等。展覽目的在於「取西北之文化特徵，物產實況，公開陳列，供各界之觀摩，以期激發國人對西北之觀感與興趣。」⁵⁴ 整個展覽涵蓋當時中國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

⁵² 2011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恢復重建，見其官網 <http://www.ceiiedu.org/>（2016/8/22點閱）。

⁵³ 〈第十六次籌備會議紀錄〉，《西北問題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頁125。

⁵⁴ 關於國民黨開發大西北的政治脈絡及其影響，見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

遠、察哈爾、蒙古、新疆、西康、西藏等西南與西北10個省區。展品主要分成攝影、物產、宗教、風俗、古物、幣制、圖書等類別（表3），並且包括西北各縣的地方誌，以及自漢代至元代的古物、碑刻拓片等，企圖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完整呈現「西北邊疆」。雖然名為「文物展覽會」，不過絕大多數展件為照片、碑拓、書籍、地圖等文本或影像再現，而實物類展件主要是農特產品與礦植物標本等。⁵⁵

表3、《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目次

類別	細項	類別	細項
攝影類	1.陝西之部 2.甘肅之部 3.青海之部 4.寧夏之部 5.綏遠之部 6.察哈爾之部 7.蒙古之部 8.新疆之部 9.藏康之部	物產類	1.藥材 2.礦產 3.食品 4.林產 5.園藝 6.畜產 7.農產 8.工藝品 9.植物標本
宗教類		風俗類	1.漢人 2.蒙人 3.回人 4.藏人
古物類		幣制類	1.青海紙幣 2.西藏幣制 3.新疆幣制
圖書類	1.地圖 2.書籍 3.統計圖表 4.碑帖		

資料來源：開發西北協會，《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南京：開發西北協會，1936年），頁1-2。

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2006年6月），頁145-216。
Hsiao-ting Lin, "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5:1 (March 2007), pp. 115-135.

⁵⁵ 陳立夫，〈西北文物展覽會緣起〉，收入開發西北協會，《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南京：開發西北協會，1936年）。

在《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上，共登錄1,967件展件，其中明確與內、外蒙古相關者，筆者統計共68件，主要是研究踏查過程中的田野採集標本、影像紀錄、統計圖表、蒙史論著、碑文拓片、毛皮類商品等。出品人包括王文萱、邵元冲、馬鶴天、田玉霖、黃奮生、中興湧、蒙古南山堂、察哈爾張家口商會、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蒙古各盟旗駐京辦事處、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陸地測量局、日本研究會、開發西北協會、西京籌備委員會、西北科學考察團西安研究分所、甘肅省立民眾教育館等。（表4、5）

王文萱是民族人類學者，曾於1944年出任西北聯合大學邊政學系的創系主任。⁵⁶ 他主要提供內蒙地區的田野調查照片及佛教文物等。邵元冲是中國國民黨內重要成員，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1935年遊歷西北各省。他為西北文物展覽會提供大量照片，皆為其西北踏查時一路拍攝所得影像。⁵⁷ 馬鶴天（1877-1962）是中央政府重要教育官員，並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及駐藏大臣，中華西北協會、中國邊疆學會的創始成員，並以壯遊的方式，深度考察了甘肅、青海、西藏等地區，留下大量的西北遊歷考察書寫，也是此次西北文物展覽會核心策展人之一。⁵⁸ 黃奮生（1904-1960），《蒙藏周報》及《蒙藏旬刊》編輯，邊政研究學者，與馬鶴天共同創立中國邊疆學會。開發西北協會提供了該協會製作的統計資料與圖表，呈現西北的政治、人文、自然資源等風土脈絡的普查結果。

西京籌備委員會設置於1932年，是直隸於中央政府、以建設長安為陪都的專門委員會，由張繼（1882-1947）主持。⁵⁹ 雖然長安最終並未成為陪都，但整個委員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對長安歷代文物的盤點與保存，使這個破落古都，順著開發西北的熱潮，被視為中原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並絲路貿易路徑之起點。邵元冲在西北遊歷時，曾召集中央政府官員，遍祭長安城附近的周、漢、唐古代皇

⁵⁶ 黃樹民，〈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收入王汎森等著，《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頁182。

⁵⁷ 攝影影像內容，見邵元冲，《西北攬勝》（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頁1-88。

⁵⁸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1-268；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457-674。

⁵⁹ 吳宏岐，〈抗戰時期的西京籌備委員會及其對西安城市建設的貢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6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43-56。

陵，以及黃帝陵，成為中華民國民族掃墓節之由來。⁶⁰ 因此，西北文物展覽會不只呈現當時中央政府對西北國土開發策略，同時藉著陝西長安做為華夏文明發祥地象徵，宣誓國民政府統治四方蠻夷戎狄之歷史正當性。西北問題研究會在其會刊上呼籲各省確實贊助西北文物展覽會時，宣稱「西北的物質文明，雖遠遜於東南，而精神文明，卻不見完全落後。即以宗教藝術而言，其含義之深奧，信仰之虔誠，技術之精巧，氣魄之偉大，遠非東南各省所可及。凡久遊西北者，對塔爾寺之酥油燈，晒佛像以及敦煌、蘭州各處之壁畫與雕塑，莫不讚嘆其偉大精巧出人意外，可知西北文化與東南比較，所落後者僅是科學而非藝術。……」⁶¹ 強調位在華夏民族發祥地周圍的西北，雖然物質文明不高，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是東南地區所不及的。華夏與四方在「五族同源」論述下，沒有文化位階差異，而是共同成就歷史悠久的「五千年中華文明」。

表4、西北文物展覽會上的蒙古攝影類作品

攝影類編號	品 名	出品者
255	蒙古女子	邵元冲
256	蒙古女子	邵元冲
257	蒙女像 備註：由此三像，亦可窺見各時代蒙女之姿態，蒙古女性體健性溫耐勞，不愧為典型之女性焉。	王文萱
258	牧 備註：牧畜為蒙人唯一之生存，數千年依然如故。此像乘者為一蒙女，時當夕陽西下正驅牧群歸，其竿其繩，乃制服牲畜之武器，將竿一揮能隨意之所欲，將奔馳之馬牛羊套住，萬無一失誠神技也。	
259	蒙古貴族女像 備註：蒙古貴族女性其生活與中外之貴族婦女無異，亦為一寄食消耗者，觀其服裝之奢華，可知一斑矣。	馬鶴天

⁶⁰ 關於黃帝成為炎黃子孫始祖的歷史建構過程，見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77。關於民族掃墓節的起源，見周俊宇，〈民俗與政治：中國國民黨政權下的清明節再製（1912~2008）〉，《臺灣文獻》，第63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89-228。

⁶¹ 〈請西北各省切實贊助西北文物展覽會〉，《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第1卷第2期（1935年），頁5-6。

攝影類編號	品名	出品者
260	內蒙之官員及貴族之帳幕 備註：蒙古官員之服裝一仍清制，其他各情亦正如服裝之守舊與保守。	王文萱
261	德王之幕僚 備註：德王、郭王、巴貝子、蒙古兵。	王文萱
262	全羊席 備註：此為蒙古宴席中之最高者，如遇貴客始饗此席藉表尊敬，食時尚有歌舞。	
263	蒙古喇嘛 備註：喇嘛於蒙古有特殊之地位，一般人民均崇敬之，且有每戶期許留一男丁居家為俗，餘均入廟為僧之風，蒙古同胞人口數之日減，此亦其主因之一。	王文萱
264	喇嘛背經 備註：喇嘛每日有早、午、晚三次日課，背經乃集許多喇嘛，圍成一圈，彼此詰問經典，取互相砥礪之意，發問者須站立圈中。	王文萱
265	蒙人角力 備註：角力之技盛于蒙地，每逢祀典良辰，必演斯技。據余考證，當乾隆時，帝最喜覽摔跤，每於御宴諸外藩王公時，例選八旗御軍中之善摔跤者與諸外藩大力者，作角力之戲。蒙古之摔跤，殆係仿斯制。	王文萱
266	蒙女與駱駝 備註：駱駝為蒙古之唯一交通工具，有騎駝與載駝之別，騎駝行速如馬，載駝能負重致遠。圖中有鞍者為騎駝，載貨者為載駝，騎駝較載駝貴。	王文萱
267	元成吉思汗之陵寢及所用之弓箭戈矛	田玉霖
268	元成吉思汗夫人之陵寢	田玉霖
269	百靈廟康熙營 備註：昔為康熙征蒙紮營之處，地勢隱藏水草豐富，誠為草地中之屯兵良地。	
270	百靈廟全景 備註：百靈廟廟宇建築偉麗，面水背山，且左右各有一山形如拱衛，氣勢雄壯，為伊烏二盟境內唯一大廟，內蒙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即設於此，為蒙古之要地。	王文萱
271	百靈廟蒙古自治政委會辦公室	

資料來源：開發西北協會，《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頁37-39。

表5、西北文物展覽會上來自蒙古、以蒙文書寫、或研究蒙古的物件與著作

編號	品名	說明	展示歸屬類別	出品者
373	野黃芪	每擔約值價洋20元	物產類	蒙古南山堂
419	瀚海石	蒙古	物產類	黃奮生
431	大青鹽	內蒙	物產類	中興湧
467	中自生蘑	內外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01	大狐皮	內外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05	狼皮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08	羔皮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13	猾皮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14	獺皮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17	大貓皮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19	駝毛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27	羊毛	內外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30	綿羊毛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536	山羊絨	內蒙	物產類	察哈爾張家口商會
767	翅梗榆	綏遠百靈廟五當召	物產類	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
807	女兒草	百靈廟	物產類	黃奮生
821	銅佛像	蒙古	宗教類	王文萱
824	歡喜佛銅像	蒙古	宗教類	王文萱
826	宗喀巴銅像	蒙古	宗教類	王文萱
828	喇嘛禮帽	蒙古	宗教類	王文萱
843	火鑷佩刀	此刀為蒙人必備之用具，時時配於腰間，蓋火鑷為取火之用，佩刀為切食之用，篲為取食之用。	風俗類	蒙古各盟旗駐京辦事處
844	氈鞋	內蒙古	風俗類	王文萱
845	皮靴	綏遠包頭 每雙價約6元，為蒙人所穿用。	風俗類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
846	打火袋	西康 取火用，蒙藏人均用之。	風俗類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

「蒙古風景」?: 五族共和下被展示的他者

編號	品名	說明	展示歸屬類別	出品者
1008	蒙古全圖		圖書類	陸地測量局
1023	蒙古盟旗部位圖		圖書類	馬鶴天
1025	外蒙張庫鐵路圖		圖書類	
1026	內蒙張多赤錦鐵路建設圖		圖書類	
1208	蒙古通史	中島編著，大正五年鉛印本。中島曾執教於清之育材館，精通漢文，是書稿凡三易，於蒙古敘述甚確。	圖書類	
1209	成吉思汗	阪井重季，褚狩又藏合著。大正四年鉛印本。著者均為軍人，阪井為中將，內容於成吉思汗之戰略及戰史，有詳細考證與研究。	圖書類	
1211	蒙古地誌	柏原孝久濱、田統一合著，大正八年鉛印本，日文本絕版書計3冊。	圖書類	日本研究會
1212	蒙藏院調查外蒙統計表	蒙藏院總務廳統計科編	圖書類	馬鶴天
1213	滿蒙漢四書	刻本共13冊	圖書類	蒙古各盟旗駐京辦事處
1282	外蒙政治組織系統表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83	外蒙政治組織系統圖之二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84	外蒙古各盟部之面積及其隸屬系統圖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85	外蒙各部家畜分布狀況統計圖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86	外蒙家畜調查統計圖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87	外蒙喇嘛人數統計圖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編號	品名	說明	展示歸屬類別	出品者
1288	東蒙盟旗系統圖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89	西蒙盟旗系統圖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290	蒙古王公系統表		圖書類	開發西北協會
1399	路大重陽萬壽宮 焦德潤碑	元至正年 漢蒙文合刻	古物類	西京籌備委員會
1400	上天眷命敕楊德 榮住持重陽宮碑	元至正年 漢蒙文合刻	古物類	西京籌備委員會
1401	皇帝靈書碑	元代 漢蒙文合刻	古物類	西京籌備委員會
1402	大元崇道聖訓王 言敕李道謙碑	元代 漢蒙文合刻	古物類	西京籌備委員會
1403	敕孫德彧管領諸 路道教碑	元代 漢蒙文合刻	古物類	西京籌備委員會
1404	大蒙古國累朝崇 道恩命之碑	元代	古物類	西京籌備委員會
1428	蒙文碑記	白靈廟老龍蘇木	古物類	西北科學考察團西安研究分所
1950	蒙古銀幣		幣制類	甘肅省立民眾教育館
1951	蒙古銅幣		幣制類	甘肅省立民眾教育館

資料來源：開發西北協會，《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頁49-220。

整體而言，整個西北文物展覽會近2,000件的展件，漢人官僚、科學家、冒險家在西北10省踏查所得的田野照片占了三分之一，地圖及西北各縣地方志書籍占了三分之一，其他則是田野標本物件等。也就是說，整個展覽的基調，呈現漢人對西北疆域的凝視與調查紀錄，「漢人眼中所見的西北地理與風土」是展覽的核心概念。與直隸嚴智怡團隊策展的「蒙古風景」，以及陶知行策展的「蒙古生活及教育」比較，西北文物展覽會上的蒙古展件，並無明確主題，亦無「成組」或「成套」的完整展示概念，而是在廣泛的「西北文物」概念下，與其他族群的文物混融成「華夏歷史」的一部分，呈現一個模糊不清、邊界不明、連客體性都消失了的「蒙古」概念。

根據《新北辰》雜誌記者的參觀報導，西北文物展覽會開幕當日參觀人數便高達12,000人次。整個展覽共有7個陳列室，第一室主要為古代文物造像碑刻，第二室為西北各省各縣地方志與調查報告、新疆陶器、西漢木簡、高昌墓表、敦煌壁畫、新疆壁畫照片、西安古物照片等。第三室為風俗品陳列室，青海、西康、西藏人民衣服飾品，西北獸皮標本，民族學調查照片等。第四室為藏傳佛教佛堂布置。第五室展示新疆回民之衣服靴帽、樂器、宗教法器及工藝品。第六室為歷代金石古碑拓本。第七室展動物、植物、礦物標本。並且在戶外天井陳列一個真正的蒙古包，是「東南人難得見到的真物」。除了靜態展覽之外，還有動態展覽，在南京世界大戲院表演，節目包括：電影（放映邵元冲、哈定、褚民誼所攝者），蒙古歌謠，西藏歌謠，青海藏民歌謠，西康歌舞，羅羅歌舞，二胡獨奏，東北秧歌，新疆歌舞。⁶² 在西北文物展覽會的邊疆歌舞演出上，加入東北秧歌，頗耐人尋味。

關於此動態展覽，在兒童刊物《廣播週報》上，署名「暄谷」的作者在〈寄給全國小朋友們第二十五封信〉的文章中，詳細的提到：

本月十八、十九兩天，西北文物展覽會並且假座南京大戲院映演邊疆歌舞、電影，同時，那兩天的晚上還表演西北歌舞。……塞北風光，寧新考古，陝甘青遊蹤，寧新考察等一幕一幕的映了出來，這些影片都是西北實際生活的寫真。……晚上表演的西北歌舞，比影片更好看了，最初是蒙古歌謠，接著是西藏歌舞，青海藏民歌謠，西康歌謠，羅羅歌謠，二胡獨奏，東北秧歌，最後是新疆歌舞，這些都是我國邊疆的民間藝術，各有各的優點。這些歌舞雖然很多人都聽不懂，但是那美妙的音調，活躍的舞蹈，卻使每個人的心中都感到妙極了。……東北秧歌演出，大家想起了已失的東北，不禁黯然，各人心中不免都有所警惕，我想這也是西北歌舞加入東北秧歌的最大含意。……西北是我們民族的發祥地，是我們中華文化的淵源，有高大的建築，有巍峨的寺院，有天然的豐富寶藏，也有上古皇帝的陵墓。我們看到了，自然而然的會發生一種懷古的心情，因而引起我們的愛國心。⁶³

⁶² 〈消息：西北文物展覽會〉，《新北辰》，第2卷第7期（1936年），頁760-762。

⁶³ 暄谷，〈寄給全國小朋友們〉，《廣播週報》，第92期（1936年），頁47-48。

西北文物展覽會上的邊疆歌舞表演，加上了東北秧歌，在某種程度上，將圍繞著華夏中原文明發祥地的東北、西北、西南地區之歌舞，全都集中在舞臺上共同展演。目前筆者尚未找到資料顯示這些演出者是否真來自邊疆各地，遠道至南京展覽會表演，還是內地藝人演出邊疆歌舞。從宣傳照上藝人的服裝扮相來推測，後者的可能性極大。（見圖6）



圖6、西北文物展覽會主辦之邊疆音樂歌舞表演照片

資料來源：《禮拜六》，第648期（1936年），頁22。

在一片歌舞昇平的氣氛中開幕的西北文物展覽會，籌備期間曾經受到質疑。何挺傑在〈對西北文物展覽會的一點意見〉文中，建議籌備委員會「勿落以營業為目的之各種國貨展覽會之窠巢。並且徵集出品時亦不必專收集金石古董以炫耀，而應注意西北實際現象之表現。……西北古物之多人盡皆知，奸商牟利之徒時有盜賣，難阻之尤不及，況再予以營業之便乎？……至表露西北實況，吾以為能使全國人士了解西北之種種黑幕，及西北人民在地獄中之生活。……吾人認為與其陳列西北風景之攝影，不若陳列西北無褲穿之大姑娘。……總之，吾人認為此次之展覽會，不應炫富，而當示真，不應僅將優點宣布，亦當將黑幕揭

開。」⁶⁴ 不過，正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官員，鼓吹生活的藝術化，文物展覽的主要目的是發揚華夏國光，而非揭發「黑幕」。⁶⁵ 事實上，1936年6月1-14日，在南京上展著另一個更大型的文物展覽會，即倫敦中國藝術品南京展覽會。以故宮博物院國寶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文物，第一次舉行境外展出，於1935年11月28日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舉行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⁶⁶ 1936年此批國寶運回中國之後，為了昭信國人，因此在南京舉辦此展覽會，國寶展件共計1,022件，兩週展期參觀人數達30,000人。⁶⁷ 倫敦中國藝術品南京展覽會結束之日，西北文物展覽會便正式開幕。不管是「故宮文物」或「西北文物」，「文物」做為中華國族光榮歷史的象徵載體，已蔚然成為當時的主流策展論。

玖、結語：因國族政治而移動的蒙古包

本文以「觀看政治」，分析3個展覽，具體呈現蒙古脫離大清帝國宗藩制度束縛之後，欲重新建立蒙古國族主體意識過程中，被迫落入中華民國五族共和意識型態下的「內部殖民」歷程。蒙古既有的政經體系與社會結構持續為威權體制下的國家機器破壞，從「藩屬國」落入「邊疆民族」的邊陲位置。黨國中央以愛國之名，使「國家」遠遠凌駕於「民族」之上，原來文化畛域分明的共和「五族」，轉為國家管理下「內地多數民族」與「邊疆少數民族」，皆為「中華民國」統一管理。隨著「五族同源之中華民族」意識型態逐漸主導國民日常生活的政治敘事，使得原本「蒙古風景」人種展示中形象分明之客體性，被零碎化後鑲嵌進「中華民族」裡，成為面貌模糊的「西北邊疆少數民族」。隨著蒙古族的客體性不復完整被「國家之眼」看見之後，被看見的，只剩下邊疆民族服裝並民

⁶⁴ 何挺傑，〈對西北文物展覽會的一點意見〉，《西北問題》，第2卷第17/18期（1935年），頁8-9。

⁶⁵ 關於新生活運動的國民日常規範與教化，見沈松僑，〈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頁11-14。

⁶⁶ 關於此展覽會的國族議題，見吳淑瑛，〈博物館展覽與國族、文化的想像——以「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35-1936）」為例的觀察〉，《近代中國》，第157期（2004年6月），頁44-70。

⁶⁷ 〈古物展覽會誌盛〉，《新北辰》，第2卷第7期（1936年），頁758-760。

族歌舞，成為區隔「主流／邊緣」、「現代／前現代」之「社會皮膚」（social skin）符號，在官方慶典場合上，載歌載舞為國家生產「華夏同源」的和諧形象。⁶⁸

綜合以上3場與蒙古相關的展示細節訊息，筆者分析整理比較如表6。在3個展覽的策展論述中，「蒙古人」的角色可以是「被表揚者」、「被展示者」、「遠道而來的客人」、「熱情款待入幕之賓的主人」、「教育者」、「被教育者」、「翻譯者」、「被開發者」、「被研究者」、「邊疆少數民族」等等眾多身分。而唯有陶知行的「蒙古生活及教育」展內，可以看見蒙古人的積極主體能动性，因為汪印侯發明蒙文活字印刷術並提供蒙文印刷品展件，積極在滿、漢、日、俄的政治角力之中，扮演「翻譯者」與「教育者」，企圖建立「自己人教育自己人」的蒙古平民教育機制。

在「蒙古風景」與「蒙古生活及教育」展覽中，「蒙古」為一具有明確歷史脈絡、文化表現、領域疆界的民族概念。但是在「西北文物展覽會」上，「蒙古」不再是具有明確歷史脈絡、文化表現、領域疆界的民族，身分逐漸模糊，溶入「西北」方位概念，蒙古的歷史也融入華夏五千年歷史之中，不再被明確標舉，「蒙古」的主體性與客體性皆消失了，成為共同創造華夏文明的西北邊疆少數民族之一。

策展者的自我社會身分認同，也影響展覽中呈現的「蒙古」。嚴智怡身為直隸實業廳工商科科長，以推動實業救國為目的，舉辦商展促進直隸地區製造業與商業，因此蒙古物件與蒙古人在展會上「被表揚」、「被展示」，都符合20世紀初博覽會的行銷手段。「蒙古」成為全球經濟交換機制下的原物料供應端及製造生產端，也是「被貿易」的對象，直隸實業廳則扮演蒙古與國際市場的貿易中介角色。蒙古包內的日常生活展演，是活生生的故事行銷；但是，說故事的人不是車本或圖穆爾，而是中華民國的直隸實業廳。亦即，蒙古生活故事，被直隸實業廳在萬國博覽會上「代言」。「被代言」的蒙古人，在20世紀初國際貿易並政治

⁶⁸ 關於社會皮膚（social skin）理論與其應用，見Terence S. Turner, “The Social Skin,” *HUA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2 (December 12), pp. 486-504；蔡慶同，〈冷戰之眼：閱讀「臺影」新聞片的「山胞」〉，《新聞學研究》，第114期（2013年1月），頁24-26。

「蒙古風景」?: 五族共和下被展示的他者

競合中，淪為周邊各強權之間可交換的籌碼。

表6、三次展覽的概念分析與比較

	「蒙古風景」	「蒙古生活及教育」	西北文物展覽會的蒙古展件
展覽時間	1914/6/14-7/15	1924/7/3-7/9	1936/6/14-6/20
展覽地點	天津天津公園	南京東南大學	南京國貨展覽館
整體展覽脈絡	直隸省巴拿馬賽會出品預展	全國教育展覽會	西北文物展覽會
主要策展人	嚴智怡	陶知行	馬鶴天、郭維屏、董道寧
總策展經費	152,499	1,000	20,000
經費來源	直隸省實業廳	中華教育改進社	開發西北協會、新亞細亞學會、西北問題研究會等。
參觀票價	銅元30枚	銅元5枚	不明
觀眾人數	91,079	20,000	不明 6/14當日約12,000人
總展件數	約5,000件	超過30,000件	1,967件
蒙古展件數	1(組)	101件(組)	68(件)
蒙古展件類別	蒙古包及完整包內生活陳設、一隻駱駝、兩位蒙古人。	日常生活物件、食物、宗教器物、照片、地圖、書籍。	照片、特產品、日常生活器物、地圖、書籍、碑文拓片。
蒙古展件出品人	車本、圖穆爾。	籌邊協會、中華教育改進社、汪印侯。	王文萱、邵元冲、馬鶴天、田玉霖、黃奮生、中興湧、蒙古南山堂、察哈爾張家口商會、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蒙古各盟旗駐京辦事處、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陸地測量局、日本研究會、開發西北協會、西京籌備委員會、西北科學考察團西安研究分所、甘肅省立民眾教育館。

	「蒙古風景」	「蒙古生活及教育」	西北文物展覽會的蒙古展件
預設觀者身分	買賣家、好奇者。	教育界人士	關心西北開發者、愛國者。
策展論述內的「蒙古人」	被表揚者、被展示者、客人、主人、被貿易者、被代言者。	翻譯者、被教育者、等待啟蒙者、教育者。	被開發者、被研究者、邊疆少數民族、被管理者、中華民族之一。
策展者的自我社會身分認同	直隸實業廳工商科長	平民教育推動者、公共知識分子。	國土開發者、研究規劃者、愛國者。
策展論述內視展件為	可貿易商品	教育檔案資料	西北歷史文物
展覽舉辦前後的蒙古獨立運動進展	大蒙古國獨立（1911年12月29日至1915年6月9日）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1924年11月26日）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1934年4月23日至1936年7月27日） 蒙古軍政府成立（1936年2月22日）

陶知行的自我身分認同是平民教育推動者，以及不依附權勢的公共知識分子，企圖以教育作為改善階級不平等的積極手段，站在漢文化霸權基礎上，視蒙古人為亟需啟蒙的「被教育者」，同時也希望生產更多的蒙古知識分子，讓蒙古能自己人教育自己人，以走向有主體性的「自治」。

而邵元冲、馬鶴天等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是中華民國黨國體制下的愛國者。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進逼，國民黨中央強力操作愛國主義。開發西北協會的邵元冲、馬鶴天等人，藉著各項科學研究合作計畫，站在中華民國愛國者並國土規劃者的角度，視原居於中國西部內陸之少數民族為可以被國家機器開發、被研究、被巡視、被教化、被管理的國民。在「開發西北」的政治框架下，國家機器擁有境內國土地上、地下所有資源之管理與利用的最高權力。科學考古調查發掘之出土物，成為國民政府「古物保存法」下的規範管理對象；⁶⁹ 而依附國土生活的國

⁶⁹ 黃翔瑜，〈民國以來古物保存法制之誕生背景試析（1911-1930）〉，《國史館館刊》，第34期（2012年12月），頁35-40。

民，在文化表現上雖可區分成五族或更多族，但為了有效管理，採用量化的少數民族或多數民族概念，使不管哪一族的國民，皆成為國土生產力的一部分，也成為國家機器以提高競爭力之名而管理的對象。

蒙古尋求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政治動作，早在晚清便已出現。⁷⁰ 正式於1911年12月29日成立的大蒙古國，與拉薩政府訂下「蒙藏條約」，蒙藏政府雙方相互承認彼此的獨立；亦與俄國簽訂「俄蒙協約」，尋求俄國的保護與國際認同。⁷¹ 大蒙古國宣布獨立，對剛推翻滿清政權的中華民國，投下國家主權定位的震撼彈。隨著北京政府意識到，滿、蒙、藏、回等族群可能因為「驅逐韃虜」口號而逐一脫離中華民國，為要完整繼承大清帝國對蒙藏藩部的掌控，因而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修辭。但是五族共和的政治修辭，仍有可能因為「民族自決」，使各族群自成民族國家。因此，必須找出符合各族群利益、讓五族可以「共和」在一起的理由。作為多數的漢族，認為自身擔負了五族共和的能動性，因為其優越的「文明高度」可以帶領其他境內「淳樸」的族群一起邁向「現代化」，避免在物競天擇之下被淘汰。此等漢文化霸權，正是嚴智怡策展團隊認為五族可以「共和」在一起的理由。

但是，不同政治人物對於「五族共和」的解讀，充滿了歧義，形成了複雜的意識型態光譜。比較開放的左派知識分子，如陶知行，認為必須促成族群與族群之間、以及族群內部的階級平等，才是各民族可以「共和」在一起的基礎原則，因此對於內蒙古訴求自治，陶知行主張「中華民國政府應當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給他（蒙古）一個充分自治的機會」，以落實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⁷² 不過，對於「五族共和」衍生的「民族自決」分裂主義，亦有人認為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是乾脆不再談「五族共和」，而以五族同源並同化後形成之「中華民族」，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族群主體，例如蒙藏院編纂蕭颺曾提出「中華民國人民儘可稱為一族，並可稱為純粹。漢族蒙藏既屬同源，滿回早歸同化，何五族之足云，適反形

⁷⁰ 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頁394-395。

⁷¹ 其木格，《蒙古獨立與蒙中俄關係（1911-1945年）》（臺北：幸福綠光出版社，2016年），頁48-52。

⁷² 陶知行，〈內蒙革命與教育〉，《新教育評論》，第1卷第4期（1925年），頁4。

其畛域耳。」⁷³亦即，用「華夏同源」論述，消弭「五族共和」下「各自表述」的獨立意識，讓中華民國自然而然統一在一個「國族」之下。此「五族同源」論述，隨著國族建構成形，漸為主流。

自1924年之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族建構工程逐漸完成，雖然國際上並未正式承認其獨立，但在中、俄、日三強勢鄰國的競合間，蒙古人民共和國小心翼翼地爭取國際生存空間。當外蒙古獨立成為不得不然的事實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必須更謹慎地處理仍在掌握之中的內蒙古，避免日本與蘇俄深入內蒙古事務。到了1930年代，隨著抗日戰爭引發資源爭奪，形成大量內地漢人「到西北去」的開發殖民潮。同時，內蒙古尋求高度自治的呼聲不斷。在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等內蒙政治領袖提出組織自治政府的強烈訴求下，1934年2月28日，國民黨中央通過「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同意於綏遠百靈廟設置直接隸屬行政院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作為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兩年之後，1936年2月22日，德王逕行宣布成立蒙古軍政府，積極尋求獨立於中華民國之外的可能性。⁷⁴中華民國當時已進入對日抗戰狀態，蒙古軍政府被視為叛國之日本傀儡政權。

邵元冲遊歷西北之後的整批《西北攬勝》照片，曾於1935年10月27-31日，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中宣會）名義，在南京華僑招待所舉辦小型特展展出，展覽名稱為「西北文化展覽會」。⁷⁵在此特展中展出了一座小型蒙古包。從中央宣傳部釋放出來的媒體宣傳照片中，一位身穿長袍的參觀者正欠身從矮小的蒙古包門縫中窺視內部。（圖7）這個矮小的蒙古包，翌年也出現在1936年6月14日的西北文物展覽會上。蒙古包從直隸天津的「蒙古風景」，轉變為「西北文物」；使用蒙古包的主體蒙古人，雖然不再被政治不正確的展示出來，卻逐漸消融為族群界線不明的「中國邊疆少數民族」，成為被漢人觀眾窺視的不在場對象。「到西北去」不僅為了抗日，也為宣示中華民國對內、

⁷³ 蕭颺曾，〈論蒙古西藏之關係〉，《西北雜誌》，第1卷第1期（1912年），頁6。

⁷⁴ 劉學鈺，〈從內蒙古自治運動、蒙疆政府到蒙古自治政府（1933-1949）〉，《中國邊政》，第195期（2013年9月），頁24-30。

⁷⁵ 〈西北文化展覽會開幕〉，《蒙藏月報》，第4卷第2期（1935年），頁55-56。此「西北文化展覽會」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次年將舉辦的「西北文物展覽會」之熱身。

外蒙古的主權。而便於移動的蒙古包，被運至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展示著，某種程度上象徵蒙古「回歸」的政治寓意。



圖7、在南京開幕之西北文物展覽會中之蒙古包

資料來源：〈在京開幕之西北文物展覽會中之蒙古包〉，《蒙藏月報》，第4卷第2期（1935年），頁14。

在「西北文物展覽會」上，蒙古是「邊疆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五族同源下的其中一族，也是考古學家探究周邊民族如何被華夏文明漢化的研究對象之一。與此同時，蒙古帝國的開創者成吉思汗，也逐漸被國民政府標舉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⁷⁶ 而成吉思汗變成中華民族英雄的過程中，也必須歸功於蒙古包

⁷⁶ 成吉思汗並未被納入晚清時期的民族英雄系譜中，直到民國因為「五族共和」的國族建構，才成為新的民族英雄。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頁148-149。

的可移動性。

對蒙古人而言，原位於伊克昭盟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及其福晉陵，是一組具歷史神聖象徵意義、不可侵犯的大蒙古包。（圖8）世代在此的500戶守陵者，每年進行春、秋兩祭，吸引四方蒙古人到場致祭，是蒙古年度的盛大祭典。不過，隨著對日抗戰爆發，為免成吉思汗陵落入親日的內蒙古政治領袖德王等人手中，親中的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札布，於1939年請求國民政府移陵，將成吉思汗陵移至青海柴達木黃金家族後裔之處。中央政府同意協助移陵，但不是移往青海，而是移往甘肅榆中興隆山。1939年6月11日起陵，兩座蒙古包陵並成吉思汗御用文物，一路經過陝西榆林、延安，過軒轅黃帝陵到西安，最後於7月1日到達甘肅榆中興隆山東山大佛殿安陵。原為躲避戰禍的成吉思汗陵文物，在移陵過程中，卻一路沸沸揚揚地吸引各方政治人物致祭，上演政治儀式，在榆林時鄧寶珊、閻錫山等致祭；在延安時由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謝覺哉主祭，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獻花圈；在西安時，陝西省省主席蔣鼎文於鼓樓禮堂舉行公祭，參加致祭者近200,000人，國民黨陝西省執行委員會李貽燕同時撰寫了〈中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文，並廣為印行。⁷⁷ 成吉思汗陵安放於興隆山之後，1942年9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首度赴興隆山祭奠成吉思汗陵，成為中華民國年度中樞祭成陵大典之由來。移陵過程中一路累積的祭典儀式與紀念性宣傳文章，使成吉思汗最終脫去前述屠坤華1916年時筆下「蹂躪中原之韃靼種」之惡名，化身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之一。同時，1939年的移陵過程中，成吉思汗陵的兩座大蒙古包特別經過位於陝西省黃陵縣的黃帝陵，護陵官貢布札補等人向黃帝軒轅像行三跪九叩之禮，完成了某種成吉思汗「覲見」黃帝始祖的儀式。⁷⁸

⁷⁷ 儲競爭，〈英雄崇拜與國族建構：國族關懷下的成陵西遷及祭祀〉，《青海民族研究》，第25卷第1期（2014年1月），頁170-173。

⁷⁸ 孟鴻，〈成吉思汗陵寢的遷移與中樞致祭成陵〉，《中國邊政》，第177期（2009年3月），頁21。



圖8、伊克昭盟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寢

資料來源：〈成吉思汗陵寢巡禮〉，《時事月報》，第2期（1935年），頁2。

因為蒙古包的可移動性，使成吉思汗陵像一頂出巡神轎般，得以隨著戰爭快速移動。1954年，成吉思汗陵及遺物終於從甘肅榆中興隆山再度起陵，遷回伊克昭盟伊金霍洛原地，並重建陵園。成吉思汗陵的整個移動旅程，為中華民國建構出一段蒙古聖祖亦尊黃帝為共同始祖的中華民族神話歷史。而這段神話歷史，至今，仍被傳頌著。⁷⁹

⁷⁹ 最近一次中樞祭成陵大典是2016年4月2日，由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親自主祭。見〈中樞致祭成陵大典馬總統首度主祭〉，收錄於「Rti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66533>（2016/8/22點閱）。

徵引書目

一、雜誌、報紙

- 《中華雜誌》，上海，1932-1941年。
《西北問題》，南京，1932-1935年。
《西北問題季刊》，南京，1934-1936年。
《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南京，1934-1935年。
《西北雜誌》，北京，1912-1913年。
《申報：教育與人生週刊》，上海，1923年。
《直隸實業雜誌》，天津，1912-1915年。
《時事月報》，南京，1929-1937年。
《新北辰》，北京，1935-1937年。
《新教育》，上海，1919年-1925年。
《新教育評論》，北京，1925-1928年。
《廣播週報》，南京，1934-1948年。
《禮拜六》，上海，1932-1948年。
《聖教雜誌》，上海，1912-1938年。
《蒙藏月報》，南京，1934-1948年。
《獨立週報》，上海，1912-1913年。

二、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 文 祥，〈巴林紀程〉，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
延 清，〈奉使車臣汗記程詩〉，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
志 銳，〈廓軒竹枝詞〉，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
邵元冲，《西北攬勝》。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
陸文郁，〈參加巴拿馬賽會瑣憶〉，《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5輯。北京：中國文史

出版社，2002年。

張鵬翮，〈奉使倭羅斯日記〉，收入畢奧南編，《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三種》，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

嚴智怡編，《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2卷。天津：直隸實業廳，1921年。

屠坤華，《萬國博覽會遊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

佚名撰，《蒙古律例》。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

三、專書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

其木格，《蒙古獨立與蒙中俄關係（1911-1945年）》。臺北：幸福綠光出版社，2016年。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年。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

開發西北協會，《西北文物展覽會目錄》。南京：開發西北協會，1936年。

Bloembergen, Marieke. *Colonial Spectacles: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at the World Exhibitions, 1880-193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 Press, 2006.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ficial Classification of Exhibit Departments of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to be Held at San Francisco in the Year 1915 in Celebra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Panama Canal Opening, February 20, 1915, Closing, December 4, 1915*. San Francisco: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1915.

四、期刊及論文集論文

王翁如，〈實業家嚴智怡〉，《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期（1995年9月）。

白拉都格其，〈辛亥革命與貢桑諾爾布〉，《清史研究》，第3期（2002年9月）。

多捷、忒莫勒，〈民國年間蒙古族出版史事考辨〉，《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99年2月）。

汪懋祖，〈中華教育改進社緣起及章程〉，《新教育》，第5卷第3期（1922年）。

沈松喬，〈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2006年6月）。
- 沈松橋，〈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
- 何挺傑，〈對西北文物展覽會的一點意見〉，《西北問題》，第2卷第17／18期（1935年）。
- 吳文藻，〈蒙古包〉，《社會研究》，第74期（1935年）。
- 吳祿貞，〈東西盟蒙古實記（續）〉，《西北雜誌》，第1卷第2期（1912年）。
- 吳宏岐，〈抗戰時期的西京籌備委員會及其對西安城市建設的貢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6卷第4期（2001年12月）。
- 吳淑瑛，〈博物館展覽與國族、文化的想像——以「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35-1936）」為例的觀察〉，《近代中國》，第157期（2004年6月）。
- 房建昌，〈簡述民國年間有關中國邊疆的機構與刊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1997年6月）。
- 孟 鴻，〈成吉思汗陵寢的遷移與中樞致祭成陵〉，《中國邊政》，第177期（2009年3月）。
- 陶知行，〈內蒙革命與教育〉，《新教育評論》，第1卷第4期（1925年）。
- 陶知行，〈五族共和與教育者之任〉，《申報：教育與人生週刊》，第22期（1924年3月）。
- 忒莫勒，〈清末吳祿貞筆下的內蒙古東部社會及其籌蒙思想——以《東四盟蒙古實紀》、《經營蒙古條議》為基礎〉，《蒙古史研究》，第10輯（2010年8月）。
- 周俊宇，〈民俗與政治：中國國民黨政權下的清明節再製（1912-2008）〉，《臺灣文獻》，第63卷第1期（2012年3月）。
- 夏承楓，〈學術會議記錄〉，《新教育》，第9卷第3期（1924年）。
- 夏承楓，〈全國教育展覽會籌備紀略〉，《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
- 黃樹民，〈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收入王汎森等著，《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 黃翔瑜，〈民國以來古物保存法制之誕生背景試析（1911-1930）〉，《國史館館刊》，第34期（2012年12月）。
- 張繩祖，〈蒙古教育組報告〉，《新教育》，第9卷第5期（1924年）。
- 張啟雄，〈「獨立外蒙」的國家認同與主權歸屬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 刊》，第20期（1991年6月）。
-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探討〉，《新史學》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
- 楊 蓮，〈陶行知與中華教育改進社〉，《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1期（2008年1月）。
- 劉學鈺，〈從內蒙古自治運動、蒙疆政府到蒙古自治政府（1933-1949）〉，《中國邊政》，第195期（2013年9月）。
- 潤沙慶，〈論郭道甫先生與東北早期民族教育〉，《大連民族學院學報》，第6期（2006年11月）。
- 蔡克驕，〈近代中國博覽業的先驅陳琪及其著述〉，《近代史研究》，第1期（2001年7月）。
- 蔡慶同，〈冷戰之眼：閱讀「臺影」新聞片的「山胞」〉，《新聞學研究》，第114期（2013年1月）。
- 賴惠敏，〈清乾隆朝內務府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1期（2003年3月）。
- 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2011年6月）。
- 賴惠敏，〈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年3月）。
- 賴惠敏，〈清代庫倫商卓特巴衙門與商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2014年6月）。
-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2012年3月）。
- 嘎爾迪，〈蒙古翻譯家、出版家特睦格圖及其歷史貢獻〉，《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98年1月）。
- 藍美華，〈蘇俄早期對蒙政策初探（1917-1924）〉，收入《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
- 藍美華，〈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原因之探討〉，《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10卷第2期（2002年12月）。
- 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
- 藍美華，〈蒙古國際主義中的俄國因素〉，《政大民族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

儲競爭，〈英雄崇拜與國族建構：國族關懷下的成陵西遷及祭祀〉，《青海民族研究》，第25卷第1期（2014年1月）。

蕭颯曾，〈論蒙古西藏之關係〉，《西北雜誌》，第1卷第1期（1912年）。

Lin, Hsiao-ting. "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5:1 (March 2007).

Turner, Terence S. "The Social Skin." *HUA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2 (December 2012).

五、網路資料

〈中樞致祭成陵大典馬總統首度主祭〉，收錄於「Rti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66533>（2016/8/22點閱）。

中華教育改進社，官網：<http://www.ceiiedu.org/>（2016/8/22點閱）。